3886
2nd set

民族問題譯叢

CHINESE SECTION
ORIENTALIA DIVISION
LIBRARY OF CONGRESS

6
Copy

9520M

13JUN 58

2

1958

民族問題譯叢

1958年第2期目录

列寧与苏联各族人民的友誼……苏联“民族友誼”杂志〔1〕

列宁与苏維埃烏克兰……　”　”　”〔1〕

論　文

社会主义民族形成和发展的經济、政治和思想基础……П И·卡培林〔5〕

四十年来苏联的民族教育……Е·И·科热涅夫斯基〔12〕

民族学田野工作的原則和方法……Г·С·契达亚〔19〕

在殖民体系崩潰时代研究非洲民族成分的任务……И·И·波切兴〔23〕

資料与研究

人們共同体……中央民族学院苏联专家　Н·Н·切博克沙罗夫　И·О·切博克沙罗娃〔28〕

俄国和苏联文献中有關东干族起源的問題……Г·Г·斯特拉塔諾維奇〔32〕

关于社会学家国际协会第三次大会……苏联科学院通訊院士　М·Д·卡瑪利〔35〕

蘇聯各族介紹

維吾尔人……“苏联大百科全书”〔46〕

莫尔多瓦人……　”　”〔47〕

科　米　人……　”　”〔48〕

涅涅茨人……　”　”〔49〕

列宁与苏联各族人民的友誼

列寧與蘇維埃烏克蘭

列宁对于烏克兰人民的历史傳說、革命經驗和民族文化給予了很高的評价。他在偉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夜，号召俄国共产党人“在事实上要坚决地彻底地同万恶的沙皇制度发生决裂，因为它**千方百計**地使得无論在語言上、地域上、性格上、历史上都是如此相近的民族**彼此敌視**。”

列宁在苏維埃政权建立后的头几个星期里，就以他的名义向烏克兰人民发表了1917年12月3日苏維埃人民委員会一致通过的“宣言”，宣布立刻无保留地、无条件地承認烏克兰人民的一切民族权利和民族独立。

烏克兰的資产級阶拉达，以肆无忌憚的民族主义宣傳为掩飾，蹂躪了、实質上是剝夺了千百万人民群众的民族权利。烏克兰的工人和农民，为了自己切身的社会利益和民族利益，起来打倒了这些出卖祖国的叛徒。

1918年1月21日，列宁在广播中向全体人民宣布：“基輔的拉达瓦解了，烏克兰的全部政权已掌握在苏維埃手中。”列宁从烏克兰苏維埃国家建立之日起，便大力支持它的独立和“**全部主权**”。他向代表烏克兰紅軍的軍事人員說：这“**在国家关系上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1918年1月，由于任命頓巴斯各城市和鉄路車站的政治委員沒有征求烏克兰政权的同意，列宁便打电报給B·A·安东諾夫—奥伏雪因科說：**“在民族关系上需要特别慎重”**。

1919年1月，列宁祝賀烏克兰展开了强大的苏維埃运动，拟定了帮助烏克兰苏維埃政府的切实措施，同时号召烏克兰劳动人民和北方忍飢挨餓的无产阶級保持兄弟般的团結，并說明，这种团結有利于烏克兰人民，因为它可以保証烏克兰抵御外国侵略者。

列宁在提到烏克兰苏維埃政府当时的首要任务时說道：“如果烏克兰不支持受着飢餓煎熬的北方，它自己也就保全不住；如果它能帮助飢餓的北方，它自己就一定能够保全，并得到胜利。”

1919年秋，列宁拟訂了党中央委員会关于烏克兰苏維埃政权的决議草案。列宁向烏克兰的布尔什維克指出：“苏維埃机关到处充滿烏克兰城市小資产級阶”是一个最大的危險，“他們用不同的看法去理解广大农民的生活条件，并且常常掛着共产党人的招牌作掩飾。”这一社会阶层的代表混进了国家机关，特别是文化教育机关，甚至混进了党的队伍。正是这些人后来成为民族主义者的主要骨干。

1919年12月28日，列宁就战胜邓尼金的問題写信給烏克兰的工人和农民。在这个关于

民族出版社邮購簡章

1. 本社为了便利讀者購訂图書及期刊，特設邮購組。凡当地邮局和書店訂購不到本社所出版的各种書刊，均欢迎直接邮購。
2. 讀者邮購書刊，請向北京国子监特54号民族出版社发行科邮購組办理。
3. 讀者邮購書刊，須詳細写明文别（蒙、藏、維吾尔、哈薩克、朝鮮文或汉文）書刊名称著譯者、装幀、（精装、簡装或平装）版次、數量、及收件人姓名地址（机關团体邮購勿写个人姓名）讀者每次来信所用的名称請前后一致。
4. 讀者邮購書刊的書款，可由当地人民銀行或邮局汇寄，来款多退少補。为遵守邮政規章，除保价信外，信內請勿附寄現款。
5. 讀者邮購書刊用何种方式寄运，請来信說明。平寄邮費及一般包装費，由本社負担。航空邮費、掛号邮費及特殊包装（木箱或麻袋）費用等由讀者負担。并隨同書款汇寄本社。如来信沒有說明用何种方式寄运，得由本社决定。邮寄的書刊，如遇中途失落，普通邮寄者，本社无法代向邮局查詢。掛号邮寄者，本社可代向邮局查詢，并将查詢結果答覆讀者。
6. 邮購書刊一經寄出，除印刷、装訂或寄发錯誤外，概不退換。

民族出版社

北京国子监特54号

共产党民族政策的綱領性文件里，列宁又一次痛斥了“醜恶可耻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偏見”，同时也尖銳地批評了烏克兰的資产級阶民族主义。一切民族主义的偏見，不管它是从大民族或小民族当中产生出来的，在列宁看来，都是不可調和的敌人。

1920年2月2日列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員会常会上說道：“我們的政策在烏克兰已經根深蒂固”，烏克兰的苏維埃建設，每天都給布尔什維克党民族政策的英明和远見带来了新的証明。

列宁教导俄国共产党人要和烏克兰人共同解决經济建設問題。这些問題順利的創造性的解决，俄罗斯和烏克兰工人阶級友好的共同的劳动，在1920年春，被协約国新的帝国主义进攻打断了，这次进攻是利用彼尔苏茨基軍团发动起来的。这时候，列宁号召苏維埃人民一致起来保卫自己和烏克兰，抵抗帝国主义的进攻。

1920年10月2日，当彼尔苏茨基得到弗兰格尔白卫匪軍冒險进攻的支援的时候，列宁写了“告烏克兰貧农书”，号召烏克兰人民起来反对弗兰格尔。

同年12月，列宁和第八次全俄苏維埃代表大会代表中的非党农民举行了会議。在会議进行中，列宁扼要地記下了代表們的发言。在他們老老实实的发言里，列宁发見了共产党应当听取的生动的直接的农民呼声。列宁把自己的記录抄送給全体中央委員和人民委員会委員，并在上面批注着“来自烏克蘭的意見”。烏克兰代表向列宁保証：“我們絕不留下一块空地”。列宁把烏克兰叶卡特林斯拉夫省和契尔尼哥夫省代表們的要求記了下来。前者要求領导“接近生活，更接近貧农的心”，后者說，契尔尼哥夫省“沒有懶汉，貧农都在工作”。

1921年2月25日，列宁拍电向烏克兰苏維埃人民委員会热烈祝賀第五届全烏克兰苏維埃代表大会，并祝大会工作胜利。列宁在祝詞中写道：“苏維埃烏克兰貧农和工人牢固的联盟万岁！”

列宁当时还表明了自己的深刻信念，認为尽管有敌人的百般阻撓和阴謀詭計，这一牢不可破的联盟是会巩固苏維埃烏克兰和加强烏克兰共和国的。列宁还預定在短期之內亲身到烏克兰去，但是由于重病，未能实現。

1921年12月10日，列宁給全烏克兰苏維埃代表大会的賀电，已經成为永远值得紀念的遺嘱。列宁在賀电中指出了各苏維埃共和国团結起来的重大意义，指出了要用全力改善我們的国家机关，提到了重工业的大发展，并認为这是我們全部經济工作中的主要任务。

* * * *

下面把列宁在1919年3月11日对俄共（布）中央委員会关于烏克兰粮食工作的决議所提的补充意見，和1919年3月19日給A·Г·什里赫捷尔的便条以及关于烏克兰苏維埃政权的备忘录，首次发表于次：

1919年關于烏克兰苏維埃政权的备忘录

（人民委員会命令草稿）1919年1月·莫斯科

1、送大宗款項到哈尔科夫去。

2、最高国民經济委員会——应从速在那里建立工厂……以及其他等等。

3、在哈尔科夫建立中心……

派人去，

派組織者去，哪怕只有几个也好，——要通曉粮食問題的。

对俄共(布)中央委員会給烏克兰共产党的指示的补充

1919年3月11日，莫斯科

一

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員会批准3月11日对烏克兰共产党和烏克兰苏維埃政府的指示。

列 寧 1919年3月11日

二

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員会发出此項指示，建議按既定原則領导粮食征收工作，即：貧农不征，中农适当地征，富农多征。

我們建議余粮的數額要定得高一些，例如，全烏克兰定为5亿普特，要拿五分之一或十分之一来分配。

給什里赫捷尔的便条*

1919年3月19日，莫斯科

什里赫捷尔同志：

1、您在烏克兰接到中央委員会（關于在6月1日以前送5,000万

普特粮食来）的指示沒有？

2、如果未曾接到，那么在这里看到了沒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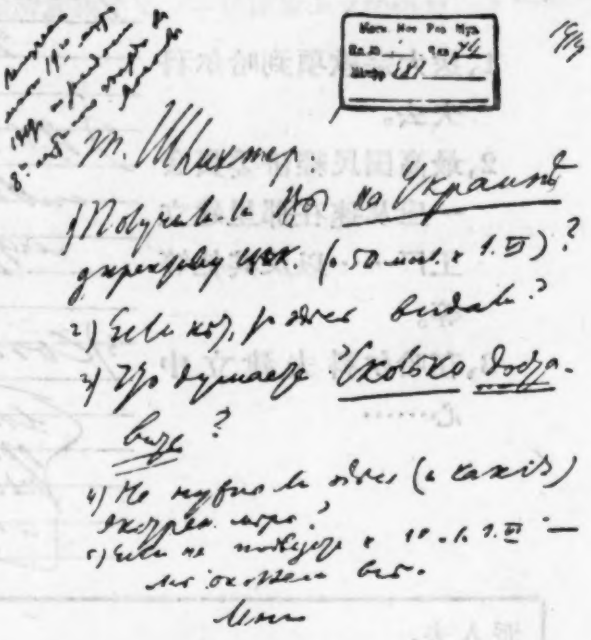
3、您覺得怎么样？可以弄到多少？

4、是否需要在这里采取（什么）紧急措施？

5、如果5月1日或6月1日以前还沒有送到——那我們全都要餓死了。

列 寧

* 什里赫捷尔在便条上角注有："1919年3月19日在莫斯科第8次党代表大会会議上接到此条"的字样。



1921年給烏克兰人民委員会議的电報

1921年2月25日，莫斯科

用直达电报发出

哈尔科夫

拉科夫斯基

請轉達我对第五届全烏克兰苏維埃代表大会的熱烈祝賀，并祝大会工作胜利。

苏維埃烏克兰貧农和工人牢固的联盟万岁！

列 寧 1921年2月25日

Передай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мое самое горячее ~~ему~~ приветствие пятому всеукраинскому съезду советов и пожелание лучших успехов в работе. Да здравствует прочный союз крестьянина и рабочих в советской Украине

Ленин.

（荣焌节譯自苏联"民族友誼"雜志1957年第11期）

社會主義民族形成和發展的經濟、政治和思想基礎

П·И·卡培林

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帝国主义鏈条最弱的一环——俄国取得了胜利。俄国是帝国主义一切矛盾的焦点，在这里，資本的全能与沙皇专制制度、农奴制残余和对非俄罗斯各族的殖民压迫錯綜在一起。

沙皇制度实行了残酷压迫俄国各族人民，强力使非俄罗斯各族俄罗斯化和压制民族文化的政策。沙皇政府挑撥各族間的仇視和糾紛，唆使一个族去反对另一个族。非俄罗斯各族劳动人民遭受双重压迫——本族以及俄罗斯地主和資本家的压迫。

各种压迫的結合使人民群众的处境变得不堪忍受，使社会矛盾变得更加尖銳和激烈。社会发展的根本需要和俄国各族人民的迫切利益都要求摧毁这种旧制度。

历史发展的整个过程使俄国无产阶級成为国际工人运动的先鋒队，世界革命运动的中心轉到了俄国。

以共产党为領导的俄国工人成功地利用了1914——1918年战爭过程中世界資本主义的削弱，从而引导俄国各族人民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在共产党的領导下实現的偉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闢了人类历史的新紀元——資本主义崩潰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胜利的紀元。俄国革命的胜利标志着人类命运的根本轉变，标志着世界历史的根本轉变：由資本主义旧世界向社会主义新世界的根本轉变。

随着資本主义的消灭，資产阶級民族也在消失，資产阶級民族的消失也和資本主义的消灭一样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資产阶級民族的消灭决不是意味着民族的根本消灭。由于偉大十月革命的胜利，由于我国資本主义的消灭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在旧的資产阶級民族的基础上，新的社会主义民族产生和发展起来。

与資产阶級及其民族主义政党所領导的資产阶級民族相反，社会主义民族的主要領导力量是工人阶級及其国际主义政党。

当社会主义民族在我国产生以前，俄国英勇的工人阶級曾与专制制度，地主和資本家进行过激烈的斗爭。在这些斗爭过程中，工人阶級是一切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彻底的代表者，是整个民主运动的領导力量。

工人阶級以其革命的范例鼓舞了俄国各民族劳动群众与沙皇制度作斗爭。被压迫各族人民的民族解放斗爭是全俄革命运动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工人阶級的共产党的革命活动，对于社会主义民族的出現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共产党早在其成立的最初几年，便依据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問題的理論，依据各族民族解放运动的丰富經驗，制定了經科学論証的民族政策。

共产党从其产生的时候起就是各族人民友好和无产阶級国际主义思想最坚决和最彻底的捍卫者。共产党把俄国各民族的革命工人都团結在自己的队伍中，高举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大旗。

共产党的創始人和領袖列宁，早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曾給予崩得份子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民族主义以坚决的回击，捍卫了无产阶級国际主义的原則。1913年，弗拉基米尔·依里奇滿意地指出："10年多来，我們高加索的格魯吉亚＋阿尔明尼亚＋塔塔尔＋俄罗斯的社会民主党人曾一起在統一的社会民主党中工作。这不是一句空話，而是无产阶級解决民族問題的办法，是唯一的解决办法。里加的情形也是如此：俄罗斯人＋拉脫維亚人＋立陶宛人……"㊀

共产党竭力强調各民族的无产者必須統一行动，必須团結在俄罗斯无产阶級的周圍。俄罗斯无产阶級領导了全俄国的革命运动，捍卫了民族自决权，与俄罗斯的大国沙文主义和資产阶級民族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爭。資产阶級民族主义企图使非俄罗斯各民族养成仇視俄罗斯民族的感情，使他們脫离反对压迫者的总的阶級斗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就曾建議党員全力給予資产阶級民族主义以坚决回击，"向无产阶級揭穿反犹太主义和其他一切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挑撥行为的反动阶級內幕。"㊁

共产党使俄国被压迫各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与工人反对資本家地主制度，爭取建立无产阶級专政的斗爭汇合在一起。偉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所以取得了胜利，是因为：共产党能够把爭取和平的一般民主运动，爭取夺取地主土地的农民民主运动，被压迫各族人民爭取民族平权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工人阶級爭取推翻資产阶級，建立无产阶級专政的社会主义运动等各种革命运动联合为一个統一的革命巨流。

1917年11月16日公布的"俄国各族人民权利宣言"是代表共产党关于民族問題观点的主要文件，它宣布了各族人民相互关系的新的、史无前例的原則，全国和全世界都响彻了宣言的綱領性原則：

"1.俄国各族人民平等和自主；

2.俄国各族人民有直至分立和建立独立国家的自由自决权；

3.廢除一切民族和民族宗教的特权和限制；

4.居住在俄国領土上的各少数民族和族体自由发展。"㊂

苏維埃国家从其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坚决地斥責了帝国主义侵略者和殖民压迫的政策，廢除了沙皇政府与东方各国签定的一切不平等条約。苏維埃国家非常了解和同情东方各族人民的民族志向，它第一个承認了阿富汗的独立，并帮助它恢复国家主权。苏維埃国家廢除了沙皇政府与伊朗签定的不平等条約，并把俄国在伊朗的許多貴重財物給了伊朗。在土耳其爭取民族独立的艰苦斗爭年代里，苏維埃国家向它伸出了友誼之手，并全面帮助它与外国武装干涉者进行斗爭。苏維埃国家第一个承認沙特阿拉伯是独立国家，眞誠同情中国、蒙古、印度、印度尼西亚、緬甸、也門、叙利亚、黎巴嫩、埃及和其他国家爭取国家独立的斗爭。

苏維埃国家从其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始終执行着以民族平等为原則的对外和对內政策。

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說，資产阶級民族主义和无产阶級国际主义是符合世界两大阶級陣营和代表民族問題方面的两种政策和两种世界观的两个口号。資产阶級民族主义思想的代表者是資产阶級民族主义政党，而工人阶級的共产党則是无产阶級国际主义思想的旗手。

当工人阶級获得了政权的时候，无产阶級国际主义思想具有了国家原則的力量。它成了工人阶級及其政党所領导的社会主义民族的主导思想。資产阶級民族发展的思想基础是資产阶級民族主义思想，而社会主义民族发展的思想基础則是无产阶級国际主义和各族人民友好的进步思想。

資产阶級民族的政治基础是資产阶級专政，而社会主义民族的政治基础則是无产阶級专政。在苏联，无产阶級专政的国家形式是苏維埃政权。代表各民族絕大多数人利益的工人阶級利用自己的統治地位来消灭一切剝削，建立以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原則为基础的眞正民主国家。

資本主义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发展是通过强迫和暴力的办法达到的。与此相反，苏維埃多民族国家則是根据自愿原則建立的。在苏維埃政权初年，列宁就曾着重指出这一根本差别："我們主張建立自愿的民族联盟，即不允許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

㊀ "列宁全集"俄文版，第35卷，第58頁。

㊁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議和中央全会决議彙編"，苏联国家政治書籍出版局1953年版，第一卷，第52頁。

㊂ "苏联民族政策文件彙編"，中央民族事务委員会参事室譯，第33頁。

施行任何强力的联盟，即基于充分信任和明确悟解亲密合作而完全自愿同意的联盟。”❶

在建立多民族国家的时候，党不能依据資本主义多民族国家及其內部不可調和的民族矛盾的倒霉經驗。

但是，共产党仍着手建立多民族国家，因为它相信，建立在社会主义和自愿基础上的苏維埃多民族国家，将是1917年10月奠定的和平建設和各族人民兄弟般合作基础的必然結果。

列宁要求实現无产阶級国际主义原則，巩固我国大小各族人民的友誼。他尖銳地批評了在解决民族政策問題上的急燥情緒和命令主义，特别是斯大林的錯誤，因为斯大林提出“自治化”草案，該草案規定的不是各平等苏維埃共和国联合，而是作为自治单位加入俄罗斯苏維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斯大林对大国沙文主义的表現采取了調和主义的态度。

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成立是我国各族人民国家建設中的历史事件，列宁在其中起了很重要作用。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成立为全苏联和每一个苏維埃共和国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經济、政治和文化的繁荣，为过去落后和被压迫各族变为先进的社会主义民族創造了一切必要条件。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1922年12月成立的，当时，各苏維埃共和国都根据自愿和平等原則加入該联盟，保存独立国家的主权，有自己的政权机关、領土、宪法和法律。

苏联——强大的工农社会主义国家——为各族人民历史上空前未有的順利发展創造了最良好的条件，保証各社会主义民族在国家、經济和文化建設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无产阶級革命消灭了資本主义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是与日益发展的生产力、生产社会性、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完全相适应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的基础是生产資料公有制——确立和巩固各民族生活各方面的同志般相互关系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私有制必然使人們分离、挑撥民族糾紛和加深民族压迫；而公有制則必然使人們相互接近、消灭民族糾紛和民族压迫。如果没有民族压迫，資本主义的存在是不可思議的，这正象社会主义的存在如果不解放压迫民族，没有民族自由是不可思議的一样。

社会主义民族发展的經济基础是日益上昇的社会主义經济制度，它是由于根据社会主义原則进行社会改造的結果，由于社会主义物質生产基础建立的結果而形成的。在共产党的領导下，苏联各族人民順利地实現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建立了工业，它是以現代技术改造整个国民經济的基础，确保了社会主义經济形式不可分割的統治和我国技术和經济的独立。苏联不到20年就走完了工业化的道路，而大不列顛却花了200年，美国也花了将近100年的时間。

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工业的分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而使中亚細亚、南高加索和我国其他各地区的經济发展获得了很大成就。在哈薩克斯坦、烏兹别克斯坦、格鲁吉亚、阿尔明尼亚、塔塔尔、巴什基里亚、雅庫特和其他各共和国，出現了許多新的大城市和工业基地，成了改造周圍各地区整个面貌的、强大的經济和文化中心。

在过去落后的民族边区建立了社会主义大工业，培养了工人阶級民族干部。与1913年相比較，1955年塔吉克斯坦的工业总产量提高了23倍，格鲁吉亚提高了26倍，哈薩克斯坦提高了32倍，柯尔克孜提高了37倍，阿尔明尼亚提高了40倍，塔塔尔提高了92倍。

共产党依据日益发展的社会主义工业的强力还实現了农村的偉大改造工作。世界社会运动史上还从未有过象十月革命后全盘集体化和消灭富农阶級这样大規模和这样深入的生产基础的改造和数千万人生活及习慣的改造。集体农庄制度在全苏联——从波罗的海沿岸到楚克特，从土尔克明斯坦的阿烏尔(山村)到新地島的涅涅茨人居住地——取得了胜利，消灭了奴役，消灭了农村的貧穷和落后，为农业生产的发展，为集体农庄农民——社会主义民族各个友好阶級当中的一个——物質福利和文化的提高創造了一切可能，这是苏联各族人民的偉大胜利。

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我国消灭了剝削阶級，消灭了产生民族压迫和人剝削人現象的基础。

苏联在自己的宪法（根本法）中确立了各种族和民族的平等。与資本主义国家使統治民族的优越

❶ “列宁文选”（兩卷集），人民出版社版，第2卷，第661頁。

地位合法化的宪法不同，苏联的宪法以及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的宪法的出发点是：語言或肤色、文化水平或国家发展水平方面的差别以及各种族和民族之間的其他任何差别，都不能成为民族不平等的原因。根据苏联宪法，我国公民，不分民族及种族，在經济生活，国家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政治生活各方面，一律平等。

苏联国家建設的形式是完全符合于我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在苏維埃政权年代里，过去沙皇俄国无权的，落后的民族边区都变成了繁荣的加盟和自治共和国、民族省和民族州，各个族体和少数民族都建立了民族区。

积极参加苏联国家建設的不仅有已形成的和正在发展着的社会主义民族，而且也有那些被十月革命唤醒的小的部族，他們形成为社会主义民族的过程还正在进行着。

1929年成立的涅涅茨民族州取得的成就是我国各小民族取得成就的一个显明例証。在沙皇制度的年代里，涅涅茨人也和北方其他各族一样，注定要貧穷和死亡，涅涅茨人在一年年地减少。B·Г·别林斯基非常关心涅涅茨人的命运，他写道，涅涅茨人的健壮臂膀都被"駭人听聞的貧穷生活和任意的殘酷迫害压在他們身上的不堪忍受和可恨的重担給折磨断。"❶

在涅涅茨民族州存在的年代里，摆脫了民族压迫的涅涅茨部族在国家、經济和文化建設中取得了很大成就。荒蕪的苦原地区的改变是說不尽的，在这儿貧穷的游牧地路程上出現了下列一些街道：納里揚馬尔，紹英納，英迪加，阿姆迭尔馬，哈里麦尔，諾索瓦。在过去无人迹的地方建立起了漁业和地方工业企业。設有商业采购机关和文化教育机关的新的居民点，促使养鹿者轉入定居和集体化，与1940年相比較，公有鹿的总头数增加了一倍多。集体农庄变成了多部門的經济。涅涅茨民族州的漁业劳动組合都有国家的机械捕魚站替他們服务，因而，使捕魚工作都机械化了。

順利的經济建設为迅速提高涅涅茨民族州居民的文化和物質福利創造了前提。与1930年相比較，这儿学校的数量增加了2倍多，国民教育的开支在这一时期增加了179倍。养鹿人和猎人的孩子上学完全公費。在涅涅茨民族州有5个文化館、12个农村俱乐部、11个农村图书館、26个大众图书館和16个紅色天幕。

革命前，苦原地区没有医疗机关，有病只能找薩滿来念咒，現在，这里建立了17个医院和39个接生站。

涅涅茨部族現在的条件对于他們发展为社会主义民族是非常有利的。过渡到定居和建立有明确界限的民族州，加速了共同地域这一民族特征的出現。在国民教育和文化教育机关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使表現于民族文化的共同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質这一民族特征表現得更加明显。在大地苦原居民的方言基础上，涅涅茨人的共同語言迅速形成的过程正在进行着，这对于涅涅茨民族的形成来說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一过程有着很大的意义，因为过去居住在苦原地区和彼乔拉河和喀拉海沿岸的涅涅茨人，几乎不懂得在森林地带从事狩猎业的同族人的語言。涅涅茨人共同經济生活的建立，以及他們与我国其他各族人民一起积极参加偉大的共产主义建設事业，是新型的涅涅茨民族形成的一个决定性条件。涅涅茨人是偉大的苏維埃强国的平等公民。

我国最高政权机关的两院制保証了各社会主义民族平等原则的坚决貫彻执行。除了代表苏联全体劳动人民（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的联盟院之外，在社会主义苏联的最高苏維埃中，还有一个代表各族人民与其民族特点有联系的特殊利益的民族院。为了进一步改进国民經济計划和全面考虑各加盟共和国的需要，保証更确切地解决它們經济和社会文化建設的問題，1957年成立了民族院經济委員会。

共产党一貫执行着全面发展苏联各共和国的政策，在国家建設中給予各共和国人民以全力援助。最近几年，实現了許多有关扩大各加盟共和国的权力和进一步巩固他們的主权的措施。仅仅在1954年和1955年当中，就有11,000多个冶金、煤炭、石油、森林和其他工业部門的企业由全联盟轉交給各共和国所有。各加盟共和国的工业产量在全国工业总产量当中的比重已由1953年的31%提高到1957年初的55%。

1956年12月和1957年2月召开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全会所通过的决議，在进一步扩大各加盟和自治共和国的权力方面前进了一大步。这些决議巩固了列宁在經济建設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同时，使全

❶ "别林斯基全集"，苏联国家政治書籍出版局1948年版，第13卷，第196頁。

国和苏联的每一个共和国生产力的发展有了更大的余地。

1957年苏联最高苏維埃通过的决議，对于进一步巩固各加盟共和国的主权也有很大的意义。現在，有关建立各加盟共和国的法院和訴訟程序的立法权，通过民法和刑法，解决省、边区行政地域結构問題，都属各加盟共和国管轄。

苏維埃国家机警地捍卫着各社会主义民族的权力，无情制止一切破坏各民族友誼的企图，严厉懲办离間各族人民的人。在苏联宪法中規定："凡因民族或种族关系对公民权利作任何直接或間接限制，或賦予公民以直接或間接特权，以及宣傳种族或民族独尊思想，宣傳民族或种族仇恨輕蔑观点之行为，均受法律之懲罰。"

苏联共产党在我国各社会主义民族发展当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共产党遵循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以及客观經济規律的知識，制定了代表社会物質生活发展的需要和苏联各族人民利益的，經科学論証并在实践中受过考驗的政策。

社会主义民族不仅在阶級成分方面，就是在社会政治利益及意向方面都是与旧俄国的資产阶級民族根本不同的。資产阶級民族所固有的挑撥民族間仇視的政策，是与社会主义民族背道而馳的，社会主义民族的最大特点是人道主义，对世界一切民族都抱友好态度，由社会主义民族的性質所决定的热爱和平。

党一向深切关怀苏联各族人民的利益及其民族特点和愿望，同时并以社会主义整体精神和关怀全国利益的精神教育各民族劳动群众。

社会主义不仅不抹煞民族差别和民族特点，相反地要保証各民族和部族經济和文化的全面发展和繁荣。共产党在領导經济和文化建設的一切实际工作中都特别注意这些特点。共产党机警地捍卫着社会主义各民族的利益，坚决給予任何資产阶級思想的表現（其中包括民族主义）以回击，保护共产主义思想的純洁性，力求达到苏联各族人民的进一步团結和各族人民偉大友誼的进一步巩固。

党及时地注意到了在闡述苏維埃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級国际主义問題上的紊乱現象，它指出，彻底明瞭这一問題，是很重要的，这不仅是为了正确地、列宁式地在我国实行民族政策，而且是为了正确建立与其他国家，其中也包括社会主义陣营各国劳动人民的相互关系。一些同志認为，好象热爱祖国是与劳动人民的国际团結和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相矛盾的。苏联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表明，这种說法是对人們的民族感情的一个侮辱，絲毫无助于社会主义各民族合作的巩固和各国劳动人民的国际团結的发展。

赫魯曉夫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員会向党的第20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总結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同国际主义的有机結合是加强各社会主义民族之間的兄弟关系的思想基础。我們党在民族政策方面过去是而且将来还是遵循着这一点的。"❶

苏联共产党的最大功迹是：它在制定民族問題的理論时，也和其他一切活动一样，創造性地发展了列宁主义的遺产，并在分析活生生的事实，科学地綜合人民群众建設共产主义的丰富經驗的基础上丰富了这一遺产。对共产党来說，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并不是死板的教条和公式的汇集，而是实际行动的战斗指南。

共产党在苏維埃多民族国家中的領导作用在不断地加强。党无論何时都是团結和統一的，党的列宁主义的团結經受了数十年的考驗，在与托洛茨基份子、右傾机会主义者、資产阶級民族主义者及一切企图使党离开列宁主义道路的份子作斗爭中更加强和巩固了。恢复列宁所制定的党的生活准則，首先是集体領导原則，促进了党的队伍的团結。

广泛宣傳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的观点，对于提高共产党員和全体劳动人民的积极性有很重要的意义。党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进行了斗爭，因为，个人崇拜的傳播降低了党和人民群众的作用，并且常常在工作中造成严重錯誤。

坚决实現列宁主义的党的生活准則，扩大党內民主，扩大批評和自我批評，更进一步提高了党組織的政治积极性，巩固了他們与群众的联系。

党順利的实現了苏联各社会主义民族領导力量的作用，因为它是以統一的观点，統一的行动和紀律团結在一起的共产党員的一个战斗团体。党的一切活动都貫穿着对人民，对劳动群众革命力量的深切信任。党的力量就在于它与人民有密切联系，而人民的力量就在于他們能团結在党的周圍。党是群众革命力量和革命創造性的鼓舞者和組織者。

❶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員会向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總結報告"，人民出版社版，第98—99頁。

社会主义民族具有着过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力量，在社会主义民族中，人民群众就更有可能发揮創造力。偉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激发了我国各族人民的巨大潛力，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創造力。今天，創造一切生活福利的工人和农民成了眞正的英雄，他們的平凡劳动是决定历史命运的偉大的和創造性的劳动。

人民群众永远是历史的眞正創造者，但是，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他們才第一次成为自己新生活自覚的和自由的創造者和主人，成为各自由民族的强大的創造力量。

以牢不可破的友誼团結在一起的社会主义民族，明显地显示出了組織和动員群众的先进社会思想的巨大意义。列宁說过，当人民群众自己动手創造历史的时候，群众的智慧，而不是某一个人的智慧，便成了巨大的現实力量。

共产党依据千百万人的巨大积极性，以先进思想武装了各社会主义民族，領导他們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偉大旗幟下胜利前进。

社会主义民族是1917年十月革命的結果而产生的新的社会經济結构的一个产物。俄罗斯、烏克兰、白俄罗斯、莫尔达維亚、拉脫維亚、立陶宛、爱沙尼亚、阿尔明尼亚、格魯吉亚、阿捷尔拜疆等社会主义民族，就其阶級成分来說，都是与旧俄国的資产阶級民族所根本不同的。与各个敌对阶級所組成的旧的民族相反，新型的民族把工人、农民和知識分子——以共同利益联合在一起的各个社会集团都团結在一起。在这些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我国取得了整个苏維埃社会道德和政治上的統一，党所創造的工人阶級和农民牢不可破的联盟，是这种道德和政治統一的稳固基础。

在旧的民族內部所产生的这一联盟愈巩固，社会主义民族也就愈巩固和愈团結。1905——1907年革命是俄国历史中最偉大的事件，它对后来国家的发展起了很大的影响，在我国各族人民的意識中留下了很深的痕迹，这一革命是工农联盟生命力的第一次考驗。

在爭取推翻沙皇制度和資产阶級的斗爭中和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形成和巩固起来的工农联盟，是社会主义民族进一步发展的有力因素。

工农联盟明显地表現在工人阶級大力援助农民鎭压富农和地主反革命分子的頑强反抗，消灭这些剝削阶級，以現代机器和技术武装农民的年代里。

現在，工农联盟則表現在城乡劳动人民为完成苏联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所提出的任务，为进一步发展工农业而进行的共同斗爭中，最近几年，有成千上万的工程师、技术員、党和苏維埃工作者，离开城市和工业中心去参加农村工作。有12万多农业专家被派到集体农庄，有2万多共产党員从城市調到农村参加集体农庄工作。工人和农民在生产上的結合，明显地表現在开拓哈薩克斯坦、西伯利亚其他各地区的未开垦的土地和荒休地的巨大工作上。由于集体农庄庄員、机器拖拉机站和国营农場的工作人員忘我的劳动，以及工人阶級的积极参加下，1954——1956年全国新开垦了3,500多万公頃土地。

牢不可破的工农联盟是順利完成党所提出的任务——到第6个五年計划末每年的粮食生产达到110亿普特，大大提高棉花、甜菜、亚麻、馬鈴薯、蔬菜、肉、牛奶、羊毛和其他农产品的生产——的保障。

社会主义的胜利为工农联盟的不断巩固創造了条件，根本改变了工人阶級和农民在民族中的地位。

工人阶級不再是被剝夺生产資料，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和被資本家剝削的一个阶級，它变成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嶄新的工人阶級，它摆脫了剝削，与全体人民共同占有生产資料。工人阶級是社会主义民族最先进的阶級，是社会主义民族发展的决定性力量，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領导权归工人阶級所有。

农民也发生了根本变化，他們摆脫了剝削，把自己的工作和財产都建筑在公有制、集体劳动和先进技术的基础上，也成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嶄新的阶級。

工人阶級和农民当中，成长起来的、忠实于各社会主义民族利益的知識分子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們不懂得剝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并有一切可能来更好地应用自己的本領和知識。先进的社会主义民族消灭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間利益的对立性。

苏維埃社会日益巩固的道德和政治上的統一，工农联盟的不断加强，更进一步加强了苏联人民的友誼，提高了它在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族中的作用。

資产阶級民族的特点是奴役其他各族人民的傾向和侵略他国領土的政策，而社会主义民族的特点則是极其尊重其他各族人民的利益。俄罗斯社会主义民族由于考虑到友好的烏克兰社会主义民族的利益而把与烏克兰接近的克里米亚轉給烏克兰。哈薩克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維埃关于把与烏兹别克斯坦接近的戈罗德草原和博斯坦迪克地区交給烏兹别克斯坦的决議，是哈薩克和烏兹别克两个社会主义民族的友誼日益巩固的一个象征。

苏联各族人民的友誼在千千万万件大小事务中表現得越来越明显，这些事务把各社会主义民族提高到新的、更高的发展阶段。我国各族人民在国家、經济和文化建設中不断加强的友好互助关系，促进了全苏联和每一个加盟共和国国民經济的高漲，促进了各共和国文化的繁荣，苏联各族人民积极参加爭取建立共产主义的物質生产基础，爭取完成苏联主要經济任务——按人口計算在产品生产方面赶上和超过最发达的資本主义国家——的共同斗爭，是各族人民偉大友誼的一个最明显的表現。

拥有巨大創造力的苏維埃多民族国家在不断地前进着，在与資本主义国家进行經济竞賽当中，取得了日新月异的成就，最近26年（1929——1955年），虽然因为战爭使苏联的国民經济遭受巨大損失，苏联的工业生产还是增加了19倍多，而整个資本主义世界的生产甚至沒能提高一倍。

苏联各社会主义民族的經济在迅速地发展着，大大地超过了資产阶級民族經济发展的速度。在1929——1955年，法国的工业生产只提高了25%，英国提高了81%，意大利提高了94%，西德提高了113%，美国提高了134%，日本提高了139%；而仅仅在最近五年（1951——1955年），烏克兰的工业生产就几乎提高了一倍，白俄罗斯提高了一倍多，莫尔达維亚提高了1.3倍，立陶宛提高了1.6倍等。在第五个五年計划中，苏联工业品每年平均的增长速度比美国高2倍多，比英国高2.8倍多。

我国各社会主义民族都积极参加了爭取完成苏联国民經济发展第五个五年計划和在优先发展生产資料生产的基础上爭取社会生产新高漲的斗爭。与1950年相比較，1955年，苏联的生鉄生产从1,900万吨提高到了3,300万吨，鉄的生产从2,700万吨提高到了4,500万吨，鋼材从2,100万吨提高到了3,500万吨，煤的开采从26,100万吨提高到了39,100万吨，石油从3,800万吨提高到了7,100万吨，电力生产从910亿千瓦小时提高到了1,700亿千瓦小时。在这一时期，机器制造业和金属加工业的产量提高了1.2倍。

由于重工业的順利发展和农业生产的提高，才使日用品的生产有可能提高76%。在第五个五年計划年代里，苏联的国民收入增加了68%，職工的实际工資增加了39%，集体农庄庄員的实际收入增加了50%。

各苏維埃共和国住宅建筑的撥款在一年年地增加，在第5个五年計划中，全苏联住宅建筑的撥款約达1000亿卢布。党和政府特别注意大力发展住宅建筑，进一步提高苏联人們的生活水平。

各社会主义民族在保健事业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就。与1913年相比較，塔吉克斯坦的病床增加了91倍，阿尔明尼亚增加了46倍，烏兹别克斯坦增加了39倍，土尔克明尼亚几乎增加了34倍，格鲁吉亚增加了9倍多，阿捷尔拜疆增加了17倍等。

革命前，我国居民的平均寿命为32岁，到1927年已提高到44岁，現在，已达到64岁。

党中央委員会所制定的許多措施将促进苏联各社会主义民族物質福利的进一步提高。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員会关于在第6个五年計划中全体職工都过渡到7小时工作制，而在地下作工的煤炭工业和采矿工业的主要工种工人过渡到6小时工作制的决議，有着很重要的政治和国民經济意义。这一决議还規定，在生产条件适合的地方，实行每周五天工作制（每天工作八小时，休息两天）。在国內实行把星期六和节日前一天的工作日縮短两小时；对青年工人实行六小时工作制。关于国家撫恤金的新法律，是党和政府关怀提高劳动人民福利的一个最明显的表現。

社会生产所达到的水平使苏联各社会主义民族不仅能迅速地发展生产資料的生产，而且能迅速地发展日用品生产，大大增加社会財富，从而向共产主义的发展道路前进一步。

第6个五年計划的完成，将导致各社会主义民族經济的进一步繁荣。各苏維埃共和国国民經济的进一步发展将保証苏維埃多民族国家实力的进一步加强，以及各社会主义民族友誼和兄弟般合作的巩固。

（高文德譯，原載“社会主义民族——新型的民族”一書、俄文版）

四十年來蘇聯的民族教育

俄罗斯苏維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
教育科学研究院民族教育科学研究所 Е·И·科熱涅夫斯基

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全国居民操150多种語言。在偉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前，沙皇俄国的一切非俄罗斯民族，生活在民族压迫之中，整个俄国被沙皇政府变成为各民族的监獄。由于沙皇政府对俄国边疆地区的属于不同民族并操不同語言的居民实行了强制俄罗斯化的大国主义政策，所以，这些地方的大多数民族的文化，都处在非常落后的发展阶段。許多民族如柯尔克孜、卡拉卡尔帕克、諾盖、卡巴尔达、阿迪盖、切尔克斯、英古什、切捷茨、列茨根等族，甚至还没有自己的文字，没有用本民族語言讀书的机会；有些民族則使用非常难学的阿拉伯文字或古代喇嘛文，而这种文字主要是僧侶用的，因此，不能够广泛使用。

专制制度有意識地阻止非俄罗斯民族的发展，因此，民族地区的学校非常少，而且主要是为当地封建主和民族資产阶級的子弟設立的。

学习的主要課目是神学（禱文、圣史〔經典〕、簡明教义問答）。在非俄罗斯民族学校里，禁止用民族語言进行教学，而在大多数場合下，使用旧的古文言語言，这种語言不論在語音上、不論在詞汇和語法規范上，同現代日常用語相去很远。

在革命前，俄国的穆斯林学校，只开設在有清眞寺的地方或信奉伊斯兰教的居民占优势的地方，学校的宗旨不是教人学习知識，而是使儿童接受宗教教育，学校的課程不外是背誦阿拉伯字母和阿拉伯詞汇，閱讀和死喟可兰經經文。

例如，Б·Х·巴尔卡洛夫在研究卡巴尔达国民教育史时写道："宗教学校，特别是穆斯林学校，在卡巴尔达教育事业的发展上没有起任何作用，学生在那里学习几年出来后，只会讀阿拉伯經文，而对經文里的字一点也不理解，也就是說仍然是一个文盲，同没有学习以前一样。

楚瓦什的作家兼民族学家И·Н·尤尔金在回憶他的求学时代时說："老师用陈旧教学法教我……老师不懂楚瓦什語，而学生不懂俄語，学生功課坏透了。学生上学不是为了学习，而仿彿是去履行学校的义务，把鞋踢破完事。既不念书又不写字，乾脆就不是学习，只是反来覆去死喟祈禱詞。"

非俄罗斯学校的这种学习方法，根本不能在非俄罗斯各族人民中間推广識字，因此，有許多人仍然是几乎一字不識。只是在某些民族中，例如，爱沙尼亚人、拉脫維亚人，識字人数的百分比还比較高些。

根据1897年的人口調查材料看来，識字的人在塔吉克人中只占3.9%，在哈薩克人中占2.1%，在沃舍梯人中占2.1%，在烏孜別克人中占1.9%，在柯尔克孜人中占0.7%，在土耳克明人中占0.6%……等。

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打碎了殖民奴役的鎖鏈，解放了居住在帝俄广大領域上的各个非俄罗斯民族，根本改变了他們的历史命运。

共产党的列宁的民族政策，即各民族平等友好和兄弟般合作的政策，消灭了民族压迫，給各非俄罗斯民族物質和精神力量的发展提供了无限的可能。使各民族能够沿着自己的經济和文化（民族形式和社会主义內容的文化）发展的道路，大踏步地向前挺进。

苏維埃政权建立四十年来，我們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强大的，人人識字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为人人識字而斗争中，成績最显著的是苏維埃民族教育的建設。

在一篇杂志上发表的論文中，不可能来追溯民族教育走过的全部複杂的路程。我們只能談談民族教育发展中的某些一般性問題。

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最初年代，苏維埃俄国各地、特别是民族地区的学校网很快地发展起来。从各种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我国各民族的居民，貪婪地响往着受到教育，到处（在农村、基什拉克、山区、阿烏尔❸）都开办了学校，向富有者征求一些住房及其他可用的房屋作为校舍，关閉了教会学校，建立了非宗教的学校，教学內容也符合了人民的要求。

但是，决不是在任何地方，更不是在一切民族学校中都能立刻作到用本族語言进行教学，因为有許多非俄罗斯民族至今还没有自己的文字，也有一些民族虽然有文字，但还没有現成的本民族的师資，而且也没有本民族文字的讀本。在这种条件下进行教学，最初通常是用俄語或有文字民族的亲属語言。

建立在农村地区的苏維埃民族学校，成为当地的文化根据地，在那里对居民进行群众性的政治教育，引导群众消灭世世代代的落后、无知、宗教偏見和迷信。通过学校，組織了在广大劳动人民中扫除文盲的工作。在民族学校中学习的，有儿童、少年，同时也有成年人和老头。

正当苏联展开民族教育建設的时候，苏联的大部分国土和民族地区（烏克兰、哈薩克、中亚細亚、远东），被国內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的火燄所籠罩。这就給民族教育的建設造成了很大的困难，立刻阻碍了这一个工作的进行。只是在国內战争胜利結束、武装干涉者被驅逐以后，工人阶級才在共产党領导下，战胜了經济破坏状态和飢饉，拿全部力量来实現教育建設的宏偉計划。

1925年8月31日，苏俄联邦全俄中央执行委員会和人民委員会通过了一項关于实施普及初等教育和建立学校网的决議。决議規定，凡是八到十一周岁的男女儿童都要入学，保証每一个儿童都能受滿四年的初等小学教育。各民族共和国和民族省的苏維埃組織，也受命根据本民族的生活条件拟制并頒布关于实行普及义务教育的法令。

尽管教室簡陋，教师不足，很多民族没有制定文字，教科书供不应求；但是，苏維埃各族人民还是战胜了所有这些困难，从1933—1934年这个学年起，苏联各民族的儿童，都开始用本族語言受到初等教育。在沙皇俄国条件下根本办不到的事，在苏維埃政权下只用十五年的时間就解决了。

实現用本民族語言进行普及初等教育，无疑是苏維埃制度所取得的重要成就之一。在这方面，国民教育各級机关还面临重重困难。而其中比較最大的困难，就是为过去没有文字的民族創立文字，以及用現代的、結构較合理的文字代替古文言文字。要克服这样一个严重的困难，还得需要苏联的語言学家、教育学家、国民教育机关的工作者以及教师們紧張的劳动十多年才行。

到1930年，最先有了自己文字的是諾盖人、卡巴尔达人、切尔克斯人、切捷茨人、列茨根人、哈卡斯人和北方各族，如涅涅茨人、汉提人、曼西人，埃文克人，楚克奇人，科利亚克人。阿拉伯文字及其他古代文字，都改成拉丁文字母。必須指出，拉丁字母代替旧的教会用的字母，在非俄罗斯族文字的发展中起一定的良好作用。后来，由于苏联各族学习俄文的心情日益迫切，于是又有了用以俄文字母为基础的字母来带替非俄罗斯語文中拉丁化字母的必要。

到1939—1940这个学年末，苏联所有的非俄罗斯各族，不包括有自己的悠久文字傳統的各族（如格魯吉亚人，阿尔明尼亚人，爱沙尼亚人，拉脫維亚人，立陶宛人），都把自己的文字改用了俄文字母。

給苏联各族創制文字的巨大工作，如編写教学和学生用的語法課本，制定科学术語，使所有的教科书、科学和文学书藉改用新字母，都由于始終不懈地执行了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由于各个科学研究机关、教育部和国民教育各部門工作者的紧張的劳动以及人民的創造精神都作到了。可是，有些問題，如各該民族的字母表怎样排列，那一种方言应当作为文学語言的基础，那一些术語应編入学校用的語法課本中等等，仍然成为有关民族学校語文教学的多次討論和会議研究的对象。

采用以俄文字母为基础的新字母，大大簡化了各民族文字的书写法，这对于民族学校的教学工作有很大的好处，既便利了学习俄文，又便利了学习本族文字。在新字母采用以前，学校里差不多同时要学习两种字母（本族文字的字母和俄文字母），学生在閱讀和书写时往往把两种字母搞混。

Б·Х·巴尔卡洛夫写道："民族文字的創立和教学中本族語言的使用，根本改变了居民对劳动

---

❸ 基什拉克（кишлак）——土尔克斯坦的村落；阿烏尔（аул）——高加索等地的山村。——譯者

办学的态度。有的居民开始在农村开办学校，各个村社的代表也接連不断地到納尔奇克城提出办学的声請，农村里的穆斯林教徒高等学校被封閉了，它的学舍被移交給各个学校使用。”

有些民族在本族文字沒有制定出来以前，只好使自己的子女用其他族的文字学习。例如，住在布里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的埃文克人的子女，就用布里亚特文字学习，住在雅庫特自治共和国的，就用雅庫特文字学习，而住在科米自治共和国的，就用科米文字学习。現在，所有埃文克人的子女，都开始用本族的，即埃文克的語言进行学习，以后将过渡到用俄語学习。

为了使一切学龄儿童都能入学起見，苏維埃国家无偿地供給貧寒学生书籍、学习用具、服装、鞋袜和伙食，并在学校中設立寄宿舍，这对于村落相距遙远的、人口稀少的地区具有重大的意义。这种寄宿学校的数量在一年一年地增多。例如，1938年达格斯坦共有56所寄宿学校，而到1956年，寄宿学校就已經有192所了。

在某些民族地区，寄宿学校的学生是完全由国家供給的。

为了保証各民族学校的学生正規地学习，在苏俄联邦的某些自治共和国和自治省（如布里亚特蒙古，山区阿尔泰，图瓦，雅庫特，卡巴尔达一巴尔卡利亚，达格斯坦等）成立預修班。預修班的开办对于提高学生們学习本族語文和俄語的成績起了良好的作用。

民族师資的缺乏或甚至完全沒有，是施行普及义务教育、实現民族化和改用民族語言教学的重大障碍。在苏維埃政权成立的最初年代，通过举办短期教师訓練班解决了培养师資的問題，培养出了能够用当地語言进行教学的教师。訓練班的課程有：本族語文，本族历史，苏維埃学校教学大綱，本族語文教学法。

由于民族学校对于师資的需要日益增长，必須要設立专門的学校培养师資。因此，在各民族共和国和民族省便成立了教育专科学校，后来改名为师范学校。这些学校专門为各民族学校培养本族語文和俄文的教师。

在苏維埃政权成立后的最初的10—12年間，共开办了100多个各民族的教育专科学校和附設在俄罗斯教育专科学校內的民族教育班。因此，到第一个五年計划末，各个民族学校中本族語文的教师已經配足了60—70%。

目前，每一个民族共和国的师范学校所培养出来的本族語文教师，足够充分滿足当地初級学校对师資的要求，各民族的师范学校担当这个任务是可以胜任的，可是对完成另外一个任务就不敢这样說：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在俄文方面都很好，因此到目前为止，有些民族共和国的俄文教师还要派俄罗斯师范学校的毕业生去担任。

为了培养中等学校的师資，在每个民族共和国和几乎每个民族省內，都成立了高等师范学校，专門为主要給各民族青年設立的中等民族学校培养师資。只是在苏俄联邦的各个自治共和国和自治省內，就有20所高等师范学校。

同时，还为民族边区的青年設立了补习学校，高等学校預备班，以及在大学里設立了預科。

有些地方，例如，在阿拉木图和馬哈奇卡拉，为了使本族的女子参加高等女学校学习而設立了高級女子师范专科学校。

近来，有些地方的师范学校（如雅庫茨克，納尔奇克，烏法），已改組成师范大学，这就可以使各民族青年受到更加淵博的教育，来滿足当地国民經济和民族文化事业对各种技术精干的专家日益增长的需要。同时，大学里的教育系，也可为民族学校培养师資。

通过各个省的和共和国的教师进修学校来提高国民教育干部业务能力的这样一个办法，对于为民族学校培养师資具有重大的意义。教师进修学校除了提高教师的小学各門課目的講授技巧外，同时还可提高俄文教师的民族語文水平和民族語文教师的俄文水平。

我們試拿过去的烏菲姆州作例子，来說明各民族共和国师資数量的增长。

在1913—1914年間，这个州只有几十个受过高等教育的教师，其中一个巴什基里亚人也沒有。

在1955—1956学年度，巴什基里亚自治共和国共有受过高等教育的教师4,000多人，其中有三分之一是巴什基里亚人。

在苏俄的其他民族共和国中也是这样的情况。

为民族学校編写教科书，是今后一个十分重要的問題。我們既沒有能編写各民族語文教科书或翻譯現代俄罗斯教科书的人才，又沒有印刷大量教科

书所需要的物質技术設备。因此，从苏維埃政权成立的最初年代起，我們就采取了适当的措施，一直到1924年，苏联各民族語文中央出版局才出版了25种語言的小学教科书。

从1931年起，为了保証分别供应每个民族学校的需要，各民族讀物的出版工作轉交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办理。在这一年內，用76种語言出版了苏联各民族学校用的教科书。

1930年在莫斯科召开的教科书編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会議，对于整頓各民族教科书的編輯工作起了良好的作用。Н·К·克魯普斯卡婭积极参加了这次会議，并在会上作了关于小学教科书編輯要点的报告。

1933年11月12日苏共（布）中央委員会关于小学和中学教科书的决議，确定了很多年来各民族学校教科书的編輯方針。

到十月革命40周年之时，苏維埃民族学校已拥有大量教学用书。

現在，苏联各民族都已經有了用本族文字編写的、供小学、七年制学校和中等学校用的各种課目的教科书，有供初級小学用的識字課本，也有供中学高年級用的算术、物理、自然、地理和历史等教科书。这些教科书，大部分是由俄文翻譯成各民族語文的；有的是各个民族共和国和民族省用本族文字和俄文自己編写的。

所有这些成績都是各个科学研究机关和各民族出版机构創造性工作的結果，这些机关所培养出来的翻譯干部，不仅很好地掌握了俄文和某种民族語文，而且还掌握了他們所翻譯的那門課目的专业知識。最複杂的問題，是把某些科学术語譯成各种民族語言。此外，編写适合本族語文特点的俄文和本族語文教科书，也还存在不少的困难。

現在，大多数民族共和国和民族省，都有自己的有經驗的翻譯干部和作者，他們主要都是当地人并很熟悉民族学校教学的情况。

各民族学校所用的教科书的册数，逐年在不断增长。如果說从1933—1935年三年間共印行了教科书8,500万册，那末按照計划只是1957年一年就印行了7,300万册。

只是供苏俄联邦（其中包括14个自治共和国，7个自治省和10个民族州）各个民族学校用的教科书，就用50种文字出版。

值得提出的是，在一个不大的达格斯坦自治共和国中，就用7种語言出版教科书，其中有俄語、阿瓦尔語、列兹根語、拉克語、达尔根語、庫梅克語、塔巴沙兰語（此外，在达格斯坦还有阿捷尔拜疆学校和諾盖学校）。

在民族学校教学工作中感到困难的，是方言太多。有的民族的方言相差十分悬殊，有时操一种方言的学生，就很难看懂用同一語言中的另一种方言所編写的課本。在某些情况下要保証每个学校中所有的学生都能听懂講課，就必須要編写各种方言的教科书。例如，汉提族总共約有23,000人（1226年的調查），可是汉提族学校用的課本就用四种方言編写。这就清楚地、令人信服地表明苏联用各民族語言編写的教科书是如何的多。

就一切課目看来（語文除外），苏联的民族学校給学生講授的一般教育知識的范圍，与俄罗斯学校相同。目前俄罗斯学校中存在的問題，同样也是民族学校所需要迫切解决的問題，而且这些問題有时非常突出并且带有自己的特点。普通中等学校的綜合技术教育，培养学生参加生产劳动和农业生产的感情，这也是民族教育的基本問題之一。要解决这个問題，在苏联各族生活习慣非常不同的条件下，就不能采取千篇一律的方式。

例如，对于塔吉克共和国、达格斯坦山区或图瓦自治省的学校来說，技器操纵、电力技术和农业等大学实习課程提綱，就要求与苏俄教育部規定的有所不同。极北方民族学校的教学方針，应当是使学生熟悉当地居民的一些生产知識，如狩猎、捕魚和养鹿，而不是苏俄教育部所規定的教学計划中的那些知識。总而言之，对学校实行技术教育的一般方針和中央发布的綱領性指示，須要作某些变动，使之适合于某一民族共和国、民族省和民族州当地教学的条件。目前，正在最緊張地寻求使学校的綜合技术教育更适合于各民族地区当地生活习慣的途徑。

大多数民族共和国和民族省学校的特点，在于教学不是使用一种語言，如同俄罗斯学校那样，而是两种平等的語言，即本民族語和俄語。

例如，有的民族在十月革命以后創制了自己的文字，可是还没有比較发达的文学（如达格斯坦、契契諾伊庫舍梯亚、加尔姆自治省，极北方等），在他們的学校里可用本族語言进行教学，但只限于小学、七年制学校和中等学校的一至四年級，在其他

的班次，本族語言可作为一門課目学习，而教学仍然用俄語。

在楚瓦什、馬里、莫尔达維亚、烏德摩尔梯、雅庫特等自治共和国的学校里，一至七年級用本族語言进行教学，八至十年級用俄語进行教学。

最后，在各加盟共和国以及加入苏俄联邦的巴什基里亚和韃靼自治共和国的民族学校中，各个年級（从一到十年級）的各种課目，都用本族語言进行教学。

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居民，他們属于同一个族但分居在苏联的数个民族共和国和民族省內。在这样情况下，操同一种語言的每一部分居民，都可使自己的子女用本族語言学习。因此，在烏兹别克斯坦除了烏兹别克学校和俄罗斯学校外，也还有卡拉卡尔帕克、塔塔尔和朝鮮等族的学校；在柯尔克孜也有烏兹别克、塔塔尔、哈薩克等族的学校；在巴什基里亚也有塔塔尔、烏德摩尔特、莫尔达維亚、楚瓦什和馬里等族的学校；在主要居住着俄罗斯人的古比雪夫省，也有巴什基里亚、塔塔尔、莫尔达維亚、楚瓦什、馬里等族的学校。

在民族学校講授本族語文課，首先需要編制教学大綱，确定学习材料的范圍，按年級分配学习分量，指出教学的基本方法。这一工作需要占去很长的时間，因为远不是各种語言的一切文法問題都得到了解决，还有一些問題，如那些术語需要用本族語言編在教科书中或用在教学中，尙待研究。

自然，供民族学校語文課使用的第一批教学大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摩倣俄罗斯教学大綱編制的，它沒有反映出民族語文的一切特征和特点，沒有表明民族語文和俄語在文法結构上的不同。这些缺点，也还存在于首批出版的民族語文文法教科书中。

只有关于語言的科学发展了，每个民族文学語言的規范得到整理，出版了民族語文詞典，累积了各个年級进行民族語文教学經驗，这才有条件来改善苏联各族語文的教学大綱和教科书。現在，各个民族学校都有相当固定的民族語文教学大綱和語法基础讀本。当然，不論是教学大綱或是語法基础讀本，尙須要进一步改进。

在編制民族語文教学大綱和民族文学讀物的过程中，也曾遇到了重重的困难；在这一方面，尙待許多民族共和国和民族省作更大的努力。

現在，研究民族語文教学法的問題，較之研究課文內容的問題要少些。各种語文的教师，深切感覚到需要在教学法上得到指导。近几年来，各民族共和国和民族省对于这些問題的研究十分活跃：如召开教师和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議，撰写“教育論文”，交流优秀教师的經驗。在烏兹别克斯坦、塔塔尔、达格斯坦、楚瓦什，都为小学和中学的教师出版了关于民族語文教学法的綜合性的参考讀物。

俄語在民族学校的学制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苏联各族人民有权把俄語称为第二民族語言，俄語是苏联各兄弟民族相互交往的一种手段，同时也是各民族吸取社会主义文化的最重要方法之一。

俄語对苏联各族的語言起了良好的影响，首先用社会政治以及科学技术方面的术語丰富了各民族語言。反过来，俄語也靠各民族語言丰富了自己。俄語和民族語言，是用友誼联系在一起的各民族平等的語言。在这些語言之中，沒有这个語言压倒那个語言的斗爭，正象在我們国家中各社会主义民族間沒有爭夺統治地位的斗爭一样。除了民族語言外，俄語也是每个苏維埃公民的財产，而不論他属于那个族；这就是为什么在各个民族学校中，不論小学和中学，都学习俄語。

今天，当技术教育的发展和培养学生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受到相当重視的时候，在民族学校中学习俄語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学好俄語，是学生掌握苏維埃技术的入門之徑，同时也是一种培养能够掌握、并創造性地发展現代化高度技术干部的一个必要条件。

在民族学校中設立俄語課，决不是排挤民族語言的学习，因为学习俄語是建立在学生学习本族語言即母語的基础上的。把俄語的文法等規范同民族学校的学生用以思考和說話的民族語言的規范加以对比，就可帮助学生比較迅速和容易地克服学习和使用俄語所遇到的困难。

在多数情况下，本族語言和俄語属于不同的語系。例如，在民族語言中有俄語中所沒有的語音和文法类别（如后置詞，職务詞），反之，在俄語中也可遇見民族語言中所沒有的語音和文法类别（文法上的性，动詞的体等）。

在民族学校中学习俄語时注意本族語言的規律，对比一个語言和另一个語言的語言事实，乃是克服非俄罗斯学生学习俄語的困难的一个可行办

法。

在語音学和文法結构上，苏联各族的每一族的語言，都有不同于其他族語言的特点，这就造成了在民族学校中学习俄罗斯語言的特殊困难。要克服这些困难，就必須有特殊的方法。由此可見，这就有必要为我国每一个民族的学校編写一部俄語文法課本，并为民族学校的教师編輯专門的教学法参考讀物。

当然，要解决在民族学校中进行俄語教学的具体教学法的問題，首先必須用語言学的观点对本族語言和俄語作比較說明。这是在民族学校中进行俄語教学所用的苏維埃教学法的主要原則，这一点已經应用在教育学院民族学校系以各种不同語言（如塔塔尔語、莫尔达維亚語、馬里語、布里亚特語、埃文克語等）为具体例子撰写的許多著作中（其中有Н·К·德米特里耶夫，В·М·契斯卡科夫，ф·ф·常維特金，Н·З·巴克耶娃，А·ф·保依磋娃等人的著作）。

此外，还应用这个原則写成了許多篇关于民族学校俄語教学法的学位論文和許多参考讀物，这些讀物已在許多民族共和国和民族省印发。

那末，各民族学校建立四十年来在改进俄語教学方面究竟具体作了些甚么呢？

各个加盟共和国都根据本族語言的特点編制了俄語教学大綱。苏俄联邦为各个民族学校制定了标准教学大綱，每个自治共和国和民族省可根据这个大綱制定本地的教学大綱。

必須說明，这些教学大綱还需要进一步改善，多余的理論材料还需要精减和縮短，对学生会話和书写的督促需要特别重視，对民族学校的特点以及每一民族語言的特点必須加以更全面地注意。

各个民族共和国民族省都出版了自己的俄語教科书，这些书的作者大部分都是在民族学校作过教員的当地人。

同时，还出版了篇幅很大的教学法刊物，它的任务是帮助教員合理地組織俄語教学。其中研究的問題，主要是講授俄語詞法和正字法的問題以及非俄罗斯学生用俄文会話和写作的問題。有很多民族共和国还給教員編写了实用参考讀物，其中关于在小学进行俄語教学的基本問題作了应有尽有的介紹（例如，談格魯吉亚学校的是С·Д·普尔采拉捷，В·杰姆莉娅和В·阿瓦利什維里；写阿尔明尼亚学校的是麦尔庫苗和卡拉克西沙場；写烏兹别克学校的是А·В·米尔托夫；写土耳克明学校的是保格达諾夫；写柯尔克孜学校的是П·И·哈拉柯夫；写楚瓦什学校的是М·Я·西罗特金，写布里亚特蒙古学校的是И·В·巴拉尼克夫和庫德拉采夫；写阿捷尔拜疆学校的是З·Д·克苏别里；写沃舍梯学校的是А·Г·巴西也夫；写雅庫特学校的是В·Я·达尼洛夫等等）。

В·М·契斯卡科所写的大部头参考书“民族学校中的俄語教学法基础”已經出了四版，这本书科学地总結了苏維埃民族学校所累积的俄語教学法的經驗。

供民族学校使用的各种参考书的出版，一年一年地增多。例如，近6年来，柯尔克孜就出版了供初級学校用的数种不同名称的俄語参考讀物。此外，还出版了供师范学校用的初級学校俄語教学法讀本，詞法和正字法图表，句法图表，俄—柯尔克孜詞典。雅庫特的师資进修学校，近几年出版了大量的关于雅庫特学校俄語教学法的讀物，其中有В·Я·达尼洛夫写的两本书“会話課本”和“雅庫特小学的俄語講授法”，有“教育作品年刊”，其中收集了雅庫特小学教师的各种报告，还有15本可帮助雅庫特小学教师解决俄語和俄文教学中各种疑难問題的小册子。

各民族共和国都用本民族語文出版了教师报，其中刊登一些关于发展民族教育、建設地方学校的問題，报导教师們的学习和生活。教师报上也时常有俄語教学专欄，专門报导各地民族学校俄語教学問題。例如，塔什干出版的烏兹别克共和国“教师报”，卡賢出版的塔塔尔自治共和国“教师报”就是这样編輯的。从1947年起，阿捷尔拜疆出版了一种名叫“非俄罗斯学校俄語教学法集刊”（一年出10期），作为“阿捷尔拜疆初等教育”杂志的附刊。

最近十年来。关于民族教育建設問題的科学研究工作引起了极大的注意。在每个加盟共和国中，立陶宛除外，都有关于教育的科学研究机构（有些共和国叫作教育学研究所或教育研究所）。在教育科学院系統內，成立了民族教育研究所，它的主要任务，是研究与苏俄联邦各个自治共和国和民族省改善民族語和俄語教学有关的問題。在教育科学院总的領导下，在馬哈奇卡拉市成立了达格斯坦自治共和国的教育研究所，它的任务是解决多語言的达

格斯坦教育事业中各种特殊困难。

上述各个民族共和国的科学研究所所研究的主要問題，是关于教学內容、本族語文教学大綱、俄語教学大綱、本族語文和俄語教科书的編輯以及对不同年龄学生进行語文教学的教学方法等問題。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向苏維埃国家提出了建立綜合技术学校、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的任务。为了实現这一任务，各民族共和国和民族省正在緊張地寻找发展民族教育的新途徑，使民族教育更符合現代共产主义建設的要求。

下面很不完全地举出1957年8月間所召开的一系列关于民族学校教学問題代表会議和大型討論会：在馬哈奇卡拉市召开了实用科学代表会議，討論了在达格斯坦学校实行綜合技术教育的問題；在伊热夫斯克举行了烏德摩尔梯自治共和国的教师代表大会，討論了小学教育工作和綜合技术教育的問題；在列宁格勒举行了极北方各族学校的大型座談会；在塔什干城举行了关于烏兹别克語教学問題会議；在阿什哈巴德召开了土耳克明的俄語小学教师与师范学校講师的全国性的討論会。1957年9月，在埃里溫举行了关于阿尔明尼亚学校俄語教学問題的科学討論会。这些討論会和座談会的特点，是小学教师、中央和各地方科学研究机关的工作者以及高等学校講师的同心协力。

值得注意的是，近来又举办了共和国間的关于民族教育工作的座談会和討論会：1956年8月間，在塔什干城召开了中亚細亚各共和国和阿捷尔拜疆关于改进民族学校中俄語教学工作的科学討論会；而1956年10月，又在里加举行了关于在拉脫維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学校中怎样进行本族語、俄語和外国語教学的科学討論会。

为了加强各共和国間就民族教学工作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問題，即俄語教学問題进行联系，从1957年起在莫斯科出版了一种专刊“民族学校的俄語教学”，这个杂志的任务是：帮助教师寻求俄語教学中的最切实可行的方法，向教师介紹各民族共和国的学校和国外学校的先进經驗，协助教师在現代教育学、心理学和語言学的基础上对于民族学校中的俄語教学法問題作科学地研究。

苏維埃人民有权为自己国家40年来在国民教育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而自豪。一切学龄儿童都可用本族語言受到教育。目前已經普遍实現了七年制义务教育，并正在实現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关于过渡到普遍中等教育（十年制）的指示。

过去有許多族沒有自己的文字，現在已經有用苏联各族語言出版的报紙、杂志、教科书、科学和文学讀物。

十月革命以前，在塔吉克斯坦每200人中只有一个人識字，总共才有10所小学；現在那里約有2,600所学校，共有学生30多万人。在柯尔克孜共和国，学龄儿童入学的人数已較之1914年增多45倍，而在土耳克明共和国，則增多33倍。

談到苏維埃国家在民族教育建設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时，我們不可忘記在这一工作中还存在不少严重的缺点，其中主要的缺点就是学生的本族語文和俄語的成績不够好，特别是在农村学校中。要克服这一缺点，就必須进一步改善和修訂教学大綱，修改教科书，制定出一套不論对于那个学生都是切实可行的本族語文和俄語的教学法。这就給各民族共和国的科学研究所提出了这样一个任务：在尽可能短的期限內，綜合利用各民族学校所累积的本族語文和俄語教学的成功的經驗，給教师提供一切足于大大提高学生本族語文和俄語学习質量的必要条件。

（張炼、蕭奏譯，原載“苏維埃教育”雜志1957年第11期）

民族學田野工作的原則和方法

（1956年5月在列宁格勒民族学会議上宣讀的報告）

Г·С·契达亞

到目前为止，在苏联民族学著作中对民族学田野工作的原則和方法还没有給予应有的注意。

大家知道，没有一門科学是不具事实的。民族学主要是在現实生活中来获得事实。越是能更多的取得确实可靠和有价值的事实，就越是容易了解和綜合这些事实，越是容易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的学說来确定各种現象的規律性。

这个複杂的科学研究过程中的首要一点，乃是确定所收集到的各种事实和現象的客观性和确实性。

例如，民族学与考古学不同，民族学是用对現实生活进行直接观察的方法来收集这种具体資料的。这也就是民族学有别于其他各門历史科学的特点。

可以断言，如果不是有計划地、系統地研究和調查人民文化和生活的特征和特点，那就不能比較完善的重建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就不能重建物質財富創造者的历史、人民群众的历史。可以說，没有一門历史科学能象民族学那样是如此地接近于物質財富的直接創造者。

活生生的民族学現实首先就是劳动人民的經驗知識、劳动經驗、生产技能以及他們的文化和生活。人民生活和文化的这些特征其根源来自远古时期。不是所有的人民的經驗知識，都随着产生他們的条件的消失而消失了，而是其中有一些得到改进并継續存在于人民生活当中。

人民的經驗知識极其丰富，这是众所周知的。为了明确起見在这里例举一二。

在高加索的某些土著民族中有过这样一种情况：即当耕地上杂草丛生的时候，农民們就开始播种黍子。因为黍成熟得快，可以在春末播种，这时田野里一般都长滿了野草，翻耕的时候，用犁翻起杂草的根，于是便割除了这些杂草。残存下来的一些杂草，在割草的时候也就被拔除了。一般来說，在这种耕地上黍总是会获得丰收。况且，农民們有时还会利用某些杂草。如用少量"麦兰草"（Cephalaria syriaca L.）的种子掺入谷子，做出的面包滋味更加香美，并增强它的粘性。增加粘性这一情况对在高加索式的炉子（泥質圓筒状烤面包的用大器具）里烤面包有很大的作用；因为粘性差的谷物不易粘住炉壁，易于脫落而被燒焦。一般說来这种炉子在高加索总是与富于粘性的谷类随同并用的。在高山地区由于地势气候关系谷物不够成熟，因而粘性差，这种高加索式的炉子也就用不着了。●

另一个例子，当格鲁吉亚的村庄缺乏"Саанеуло пури"（格鲁吉亚的一种谷类，其另一名称是"Долис пури"—Tr.vulgre）的种子时，农民将春麦（即所謂"Дика"—Tr.ibericum，也是一种谷类）在秋季播种。大多数的这种麦苗都被凍死了，只有一部分經受住了冬寒并在春天又长出了青穗。农民把这种秋种的"Дика"作为"Саанеуло"的种子，秋季里又把他們播种下去。第二次种下去的"Дика"易于經受冬寒，再收获得来的穗已是"Саанеуло пури"而不是"Дика"了。

"Дика"在格鲁吉亚乃是最古老的一种谷类。在格鲁吉亚的山区，直到今天它还被作为一种春季播种的谷类而存在着。"Саанеуло"也是相当古老的一种谷类，它在格鲁吉亚的平原地区分布甚广，也是作为很多种秋季播种谷类中的一种存在着。所以，难怪格鲁吉亚的农民在对这些谷物进行长期观察的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有效的实际技能和方法。

● Г.С.契達亞："格鲁吉亚式爐子"載"格鲁吉亚民族学資料"（格鲁吉亚文，有俄文摘要），第16卷，梯弗利斯1953年版。

这里再順便提一下，在流行种植“Дика”的地区，耕地时用的是輕便犁（“ачача-гутани”）；而在平原，即在流行种植“долис пури”的地区用的則是重型犁（“Саанеуло гутани”）。这后一种情况是与特殊的劳动組織形式（如“Молгамь”，“Мондевь”，“Уламь”，“амбазь”）有关，也是与有人口密集的居住有关。

那末，这些民間的經驗知識是怎样取得的呢？直接生产者在利用周圍环境和适应这个环境的过程中，必須利用自然界的規律，并根据这些規律来行事。这种情况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人們的感覚能使他們对周圍环境得到一般是正确的观念。列宁指出：“如果人的感覚不能使自己对环境得到客观正确的观念，那么他在生态上就不能适合于环境。”㊀

但是，单凭直覚还不能发現自然的規律。这个任务就要靠实踐和以实踐为基础的科学来解决。原始时期的人，当他利用两块木材摩擦取火的时候，根本就沒有意識到是在把一种能轉变成为另一种能，这个自然規律是在人們的实踐和理論活动中发現和証实的。

在人类历史漫长的岁月里創造了許多文化財富。人們之开始創造这种文化財富，并成为这种或那种文化綜合体的体現者，是在他成为人的时候就已开始了的。所以，反动的民族学家們关于存在着“沒有文化的民族”的說法完全是一种无稽之談。实質上，他們站在种族主义的立場，按照他們的原則，認为存在有积极的創造性的种族和民族，也有消极的非創造性的种族和民族，也就是說，这些民族沒有創造过也不能創造出什么东西来。这一观点“論証”着种族歧視，同时它也是殖民压迫和制造民族糾紛的“哲学”支柱。在这方面，下面各流派都犯有同样的罪过，如德国的文化历史学派（B·施密特，B·科彼尔斯），法国的社会学派（涂尔干），美国的心理学派和他們的文化模式，英国的功能学派（馬凌諾斯基）。这种世界观与苏联的民族学是根本不相容的，苏联民族学坚决反对这种世界观。

* * *

上述情况說明了，民族学家的田野工作有着重要意义。这一工作必須具有原則性的立場和正确的方法。

民族学田野工作不是一些民族学事实和現象的簡单蒐集。它是在极其複杂的条件下进行的科学研究工作。因为田野民族学家的对象是根据一定的观点来研究活生生的人、他們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所以也就使这个複杂性更加加深了。民族学家在收集科学資料的时候，必須把他們客观地如实地全面地記录下来。

在田野工作的条件下，研究工作者可以注意和研究直接生产者的生产經驗和劳动技能，研究旧的，衰頹了的和正在衰頹着的事物同新的、发展着的事物两个互相斗爭着的方面之間的矛盾結合。但同时研究工作者也应該注意到这样一个情况，即民族学的現实乃是极端複杂的文化历史現象，特别是民族文化現象，这种現象的某些因素是容易确定下来的，而另外一些因素則难于发現和不易捉摸。就是說，田野工作的方法不仅应該保証收集得到的材料的可靠性，而且还应該使民族学材料不致落在民族学家的視野之外。

但是，这还不完全。只有下面这样一种收集事实材料的方法才能看作是正确的，即它能把上述文化現象从比較主观重量的描述轉变而为客观而又重質的描述。此外，收集各种現象不能局限于它們的統計数字，而且应該把它們看成是运动的、发展的、辯証和历史的。彻底的历史主义是民族学中苏維埃学派所特有的，在民族学田野工作中应广泛采用它。苏联的民族学家在研究任何一个民族文化的民族特征时，还应“揭露該民族历史发展各个不同时期的文化阶段，注意到該民族过去历史命运全部複杂性在文化中的反映。”㊁

其次，民族学的現象和事实决不能孤立地来研究，也决不能脫离周圍的現象来研究。大家知道，假使孤立起来看的話，沒有一个自然現象是可以被認識的。

最后，在民族学田野工作中所要求的，不是表面和片断的描述，而是要完全反映事物和現象；不尽要描述它的外部，同时也要描述它的內容。

对民族学田野工作所提出来的这些要求，乃是

㊀ “列宁全集”，俄文版，第14卷，第166頁。

㊁ Г·契達亚：“普通民族学問題，”“文化”概念，載“格魯吉亚民族学資料”（格魯吉亚文），第7卷，梯弗利斯1954年版。

由苏联民族学总的原則性方針、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論所决定的。所有这些要求只有在对各个現象进行綜合研究的情况下才能实現，即一方面要研究相互联系着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現象，另一方面要把每个事物描写成“是人們劳动的总和”（馬克思語），亦即应根据材料、技术、功用等等去描述。同时文字資料必須根据原始資料来收集，而实物資料必須根据原物来收集。

按照民族学田野工作的这一方法来看，民族学观察的深度要比它的广度重要得多。深入地研究一个狹小地区要比泛泛地研究一个广闊地域（如州或省）收效大得多。多方面的研究一个資料和就地詳細地編写“傳記”，如对某一种耕地的农具进行这样的研究，要比对几十个这样的农具进行表面的描述好得多。因此，必須竭力按照各个既細小而又重要的单位如家庭、姓氏等等——来进行工作。❶

例如，依这个方法来描述拉察式耕具时就会得到下面一些結果。按其結构来說，它是一种带犁桿的耕具，同时也是这种耕具更高級的形式。如按底部构造及其用途来看，它是一种独一无二的耕具。虽然这种耕具的构造很原始，但它能翻耕草皮地。在技术方面它是相当完善的。它的各个部分或整个耕具的精細另件和整体都很引人注意。很明显，当地居民对耕具乃至它的每个部件都有着深湛的經驗知識；对耕具的各个部件有着丰富的和各种各样的称呼。在民間歌謠中也反映着农民对耕具的热爱，这种耕具和它的各个部分常常被描写成生动的物体。制造拉察式耕具要使用許多特别的工具，如砍刀（砍伐用的工具），凿子和鋤形斧等等。用当地矿石炼制的鉄犁头，形状很完善和匀称，这种犁头起源于中世紀（11世紀）格魯吉亚西部的犁头。

适用于山区农业的拉察式耕具大多被用来翻耕硷地，在这里它通常和种植一定的谷类（如“Хулуго”，“пури”“Кери”等）配合使用。其中有些是与当地一定谷类的家用炉灶有关联的。有时，这种耕具也和独特的木制鐮刀結合使用，它可以“砍掉”谷穗（“Мах”和“Зандурь”）。拉察式耕具也与上面所說过的种植粘性較大的谷类伴随使用，并且在普遍使用这种耕具的地带我們发現了高加索式的烤炉。

一种特别的集体劳动形式和崇敬耕牛的殘余，乃是使用拉察式耕具时的另外一种現象，前者就是劳动人手，耕畜、耕具的結合，后者就是反映着与耕牛搏斗以后馴养它时所表現的崇敬耕牛的殘余。著名的苏美尔的英雄吉尔加美斯和英基图曾与野牛作过这样的搏斗。这种对耕牛的崇敬在新年的时候有着丰富的表演。耕牛在民間詩歌里被描写成为文明的創始者，特别說成是农业的創始者。最有趣的是許多民間故事中的偉大英雄就是那口里含有大块泥土的用犁耕地的农民。有一个神話这样說：当許多野兽比賽誰最能为人們服务时，鹿自不量力地疾馳太空，追上了牛，但是很快它就疲倦了，从天上掉下而死去了。只有牛还是沉着稳步地走完了太空，因而取得了胜利并开始履行自己的“神圣職务”——为劳动农民服务。按照这个神話，这一竞賽就在天上留下了一条銀河和大熊星座的痕迹。

在一般綜合性的資料里，有关耕具起源的傳說也很有意思，有些傳說道：第一把耕具整个都是鉄制的（按希腊的神話，科尔赫王的耕具是鋼制的），而这种耕具是上帝为人們創造的。

对重型耕具（диди гутани）所作的研究所得到的却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从它的构造来看，这是一种具有几种不同形状的带有前輪的耕具。它的有些鉄制另件的重量达到20公斤。在制作技术上，尤以那根精巧而又短小、中央部分弯曲的犁桿最为突出。这种形式的犁桿一方面能够增加犁桿与滑木之間的距离，另方面还能均匀地分配犁所承受的拉力。“диди гутани”耕具可用来深耕土地，用它翻耕后的犁沟寬25—30公分，深50—60公分。由于它有一片橢圓形的边翼，所以能够将翻耕后的草皮推到一边。这种类型的耕具因其体积龐大而被称謂“魁梧犁”，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是由8—9对公牛和水牛牽引，而在更早一些时期是用12—14对水牛和公牛来拉的。

按农民的說法，用“диди гутани”来深耕土地，一方面可以改变土壤的結构并促使土壤肥沃，同时还能够更长久地保持土壤的潤湿。但是，笨重的犁需要複杂的“生产設备”。如制作为四对公牛用的轅具就需要三只公牛或两只水牛的毛皮。需要大量的掛鏈、羈絆等等，同时还需要許多劳动力（一个耕地的人，二个白天看守耕畜的人，二个夜

❶ С·П·托尔斯托夫：“民族学中的苏維埃学派”，載“苏联民族学”1947年第4期（中譯文載“苏維埃民族学的发展”，科学出版社版，第1——30頁）。

晚看守耕畜的人，三个赶耕畜的人等等）。

这种类型的耕具也与下列各物同用：一定的谷类（“Долис пури”和“Тавтухи”）等，烤面包用的高加索式的炉子，透平的磨子（“Долабис уисквили”），广闊的居住地（2,000—3,000戶的村落），插犁耕地，堡壘式的房子，“大車”等等。

上述諸例說明了綜合性詳細的田野工作方法的好处。用这个方法武装起来的民族学家能够收集丰富的資料，而这些資料乃是为进一步进行科学研究工作、提出和解决民族学方面許多原則性和主要問題的宝貴前提。

假使一个調查人員在收集事实資料的时候不把它看作是有联系的現象，不把它看作是反映着該族生活变动的历史証迹，那么，单純的收集事实不但不足，而且这种事实一般地不能起到任何作用。

除开这些原則性的方面，民族学田野工作方法还有其組織技术的方法。属于这种方法的首先是长期的就留“在田野”、固定的工作、計算劳动过程和文化丛体的周期（“民族学年”），通曉該族語言、电影摄影，磁带录音，航空摄影，收集民族学材料用的調查大綱等等。

田野工作的上述方法同样适用于旧有的和新的生活与文化。因为現代民族形式文化的概念不仅包括这个族的精神生活和心理素質，同时也包括它的物質文化、劳动技能和生产活动的特点。

必須指出，民族学田野工作方法中，有关一些原則性問題常常为下列各种問題所代替：如田野工作的时間、民族学家个人的品質，或調查的方式、記述材料的技术等等問題所代替。我認为在“苏联民族学”杂志上由于展开有关研究集体农庄生活的討論而得出的認識是正确的，即为了要对現代生活进行民族学研究就必須正确和彻底地采用已在实踐中經过檢驗的綜合性的詳細方法，必須首先着重注意那些文化和生活的重要因素，即那些具有民族特征显明痕迹，并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起着积极有效作用的因素。这里，我們并不想干予国外資产阶級民族学家們的田野工作方法，只是要指出一点，即按照吉特美尔（Диттмер）的意見，在各学派的代表者們之間，直到今天还在进行着的爭論，应該承認是一种无的放矢，因为田野民族学应該具有它自己本身所有的一些方法。我們已經知道，我們在这个問題上的看法正好是針鋒相对的。

現在让我們来作一个总結：

1、民族学的特点——用直接观察的方法在現实生活中吸取科学調查資料——要求田野工作有經过磨練的方法。愈是有更多的确实可靠、有价值、透彻和全面的資料，就愈是易于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及其发展規律的学說来了解、領会和綜合它們。

2、民族学的現实，任何一个民族构成的現实生活是複杂的，有时是陈旧的衰頹着的和新的进步的相互斗爭着的各因素和文化历史現象多次交叉的矛盾結合。因而，任何一个生活現象只有在与其周圍諸現象密切联系和受周圍現象制約的条件下才能被認識。此外，对現实生活的事实和現象必須以运动的，发展的和历史的观点来进行观察。

3、在民族学的田野工作中，这些要求只有在对各个現象进行綜合性研究的情况下才能实現。一方面，綜合包括結合在一起的、基础与上层建筑諸現象，另一方面，要把事物描述成是“人們劳动的总和”，即根据材料、技术和功用来描述。同时，这种蒐集民族学現象的方法只有在保証能够从比較主观重量的描述轉变到客观重質的描述时，才能認为是正确的。

4、民族学观察的深度要比广度重要。在一个狹小地区进行深入研究要比在許多广闊地区的泛泛研究重要得多。多方面的收集一个材料并对一个具体事物好好地就地編写“傳記”，要比表面地描写几十个这样的事物效果好得多。同时，文字資料必須根据原始材料来收集，实物資料必須根据原物来收集，而調查工作必須根据个别細小而重要的单位——市区、街区、乡村，谷地等来进行。

5、如果不是长期地、固定地就留在“田野”，如果不考虑到研究过程的周期性（“民族学年”），如果不具备被研究的这个民族的語言知識，就不可能对劳动过程的文化丛体进行研究。民族学田野工作的这一方針对于确定和解决一般的具有理論意义的問題开闢了很大的可能。按照这个計划所进行的民族学田野工作，乃是由苏联民族学总的原則性方針所决定的。

（金天明譯，原載“苏联民族学”雜志1957年第4期）

在殖民體系崩潰時代研究非洲民族成分的任務

И·И·波切兴

在帝国主义国家瓜分非洲之初，非洲各族还没有走上資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因而也还没有形成資产阶級民族，还没有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在非洲的許多地方，尙存在着封建国家（如埃及，埃塞俄比亚，馬格利布各国，西苏丹各国，烏干达等），这些国家的人民尙处在部族阶段。由于没有已形成的資产阶級民族和民族国家，这就使得歐洲帝国主义国家可以无視非洲各族居住的界限，乱划殖民的地边界。当然，这并不是說，有了民族国家，就有了在各个不同国家之間按民族地域划分的可能。19世紀歐洲的历史，給我們提供了足够說明多民族国家分裂和建立的范例。类似这样的例子，在其他各洲也可以看到。可是，由于非洲到19世紀还没有出現資产阶級民族和民族国家，这就使得殖民主义者滿可以不管这个地方的民族成份而加以窜改和一再窜改非洲的地图。如果我們看一看帝国主义列强关于瓜分非洲所签訂的条約，可以在很多条約中看到：他們的界限是以經緯度的座标来划分的。这样一来，不仅一个族，就是一个部落，有时甚至一个村庄都被分成了几个部分。現今非洲的情况就是如此，几乎没有一个是专門居住着某一个族的殖民地；有很多族都被划分到几个殖民地內。

这种情况一直阻碍着非洲殖民地各族人民同心协力地反对帝国主义压迫。而殖民主义者也就利用这一情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們煽起民族糾紛，挑撥一个族攻打另一个族。只要回顧一下不久以前的怯尼亚事件就足以說明这一点。1952年吉庫尤族为了自卫成立了武装部队，并进行了反对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游击战爭，当时殖民主义者武装了馬哂人，利用他們来鎭压吉庫尤人的解放运动。

現在，帝国主义者藉口非洲各国民族成份的複杂，来为保留他們的殖民制度作辯护。正象过去英国在印度所干的那样，非洲的殖民主义者宣称：我們来到这里，是为了維持各族間和平的必要；我們只要一走，部落間的战爭，各族間的互相殘杀就会发生。过去有一个法国駐非洲殖民地的总督尤伯尔·泽沙姆，于1955年1月在英国的“新共和”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大力为保留殖民制度作辯护。为此他不顧历史眞相，描絵了一幅在歐洲殖民化的前夜，好象在非洲也出現了“政治上混乱不堪”的图景，即部落間的衝突和混战的图景。“歐洲的列强应該不应該离开非洲呢？”——泽沙姆問道——“不应該，我不相信历史宿命論”，——他又自言自語地回答道。决不可以让非洲独立，因为“独立会导至支离破碎，这将意味着又重新回到混乱不堪的境地”。

1955年12月，英国的“圓桌”杂志发表了一篇标題为“非洲的独立与非洲自治問題的考虑”的文章。文章作者怀疑給予“制图学家所画的”那些国家以独立是适当的，他認为这样作会造成种族界限和殖民地界限的不相一致。

大家知道，近几年来美国对于非洲也頗感兴趣。美国研究非洲的学者也大有人在，并且出版了很多书。貝斯康教授曾在美国“政治科学社会科学年鑑”（1956年7月）上，发表了一篇題目为“自治的障碍”的文章。他写道：“歐洲瓜分非洲的結果，在非洲出現了許多从民族、政治和經济的角度看来毫无意义的界限，这就是达到自治路途上的一个障碍”

在帝国主义的宣傳中，最使人莫明其妙的是，帝国主义者硬把人为制造的界限說成是非洲实行独立的障碍，同时他們也不愿意修正这些界限。我們拿埃維族作为例子来說吧！由于19世紀帝国主义对非洲的瓜分，埃維人被划在英国殖民地黃金海岸和

德国殖民地多哥两个地方。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属多哥又划給了英国和法国。这样一来，埃維人便被划分在三个殖民地內。有些地方，法属多哥和英属多哥之間的界限要穿过一个村庄，村庄的一半通行法国法律，而另一半則通行英国法律；一半流通法郎，一半則流通英鎊。埃維人老早就想消除这种毫无意义的界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他們向联合国提出了这种請求，要求成立統一的民族国家。但是，由于英国和法国殖民主义者的反对，致使联合国沒有能滿足埃維人的这一合理要求。

事情搞成了僵局。殖民地沒有得到解放，既然殖民地的界限是人为造成的，要修正这些界限就必須要消灭殖民制度。現在，非洲各族人民正在衝破帝国主义者所造成的这种窘境，从絕境中走出来。目前已經有几个殖民地取得独立国家的資格。可是人为的界限仍然是一个不容忽視的事实，因为它可使你无路可走。毫无疑問，非洲各族本身可以改变这些界限。民族划界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是将来的事。为了实現民族划界，只消灭殖民制度和建立独立的資产阶級国家还是不够的。資产阶級的本質到处都是一样，它不依人的肤色为轉移。实际生活表明：民族划界是将来要作的事。而現在，人为的界限将为正在产生的非洲国家造成严重的困难。

殖民体系不可能在同一个时間內一下子崩潰。殖民体系是要通过一个一个的殖民地接二連三地脫离殖民体系而崩潰的。可見，新的独立的国家，是可以在帝国主义所划定的，不符合民族界限的范圍內产生的。因此，新产生的国家，将是多民族的国家。由此在这些国家里也将产生許許多多的困难。

我們拿过去的东苏丹这块殖民地的具体例子来看。随着帝国主义的瓜分非洲，形成了东苏丹这块地域。居住在这块殖民地內的各族人民所操的語言，属于三个不同的語系。北部住的是阿拉伯人，占东苏丹人口总数約53%。南部居住着尼洛特人：丁卡人，努埃尔人，什魯克人和巴利人等；西南部住的是阿占德人，其語言属于苏丹語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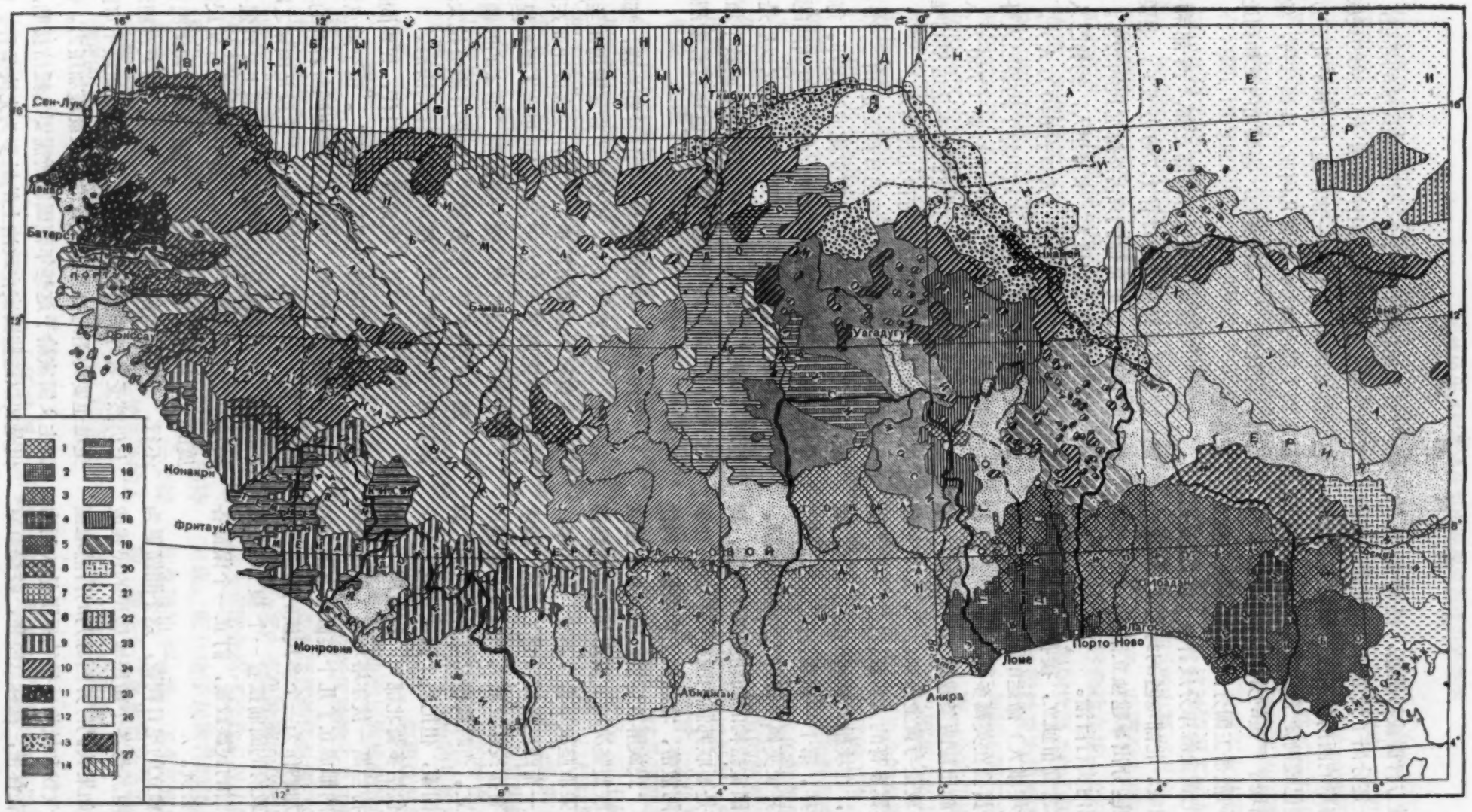
尼洛特人总共約有100万人，随着帝国主义对非洲的瓜分，尼洛特人被分割在四个殖民地內：东苏丹，烏干达，怯尼亚和比属剛果。此外，还有一定数量的尼洛特人（如延波和摩恰等部落），居住在埃塞俄比亚西南部。尼洛特人沒有形成統一的民族，但一切尼洛特人的語言都有統一的基本詞汇。此外，丁卡語、努埃尔語和什魯克語，还有同一的文法結构。关于尼洛特人的民族成分，我們几乎一点也沒有研究，因此現在我們关于尼洛特人民族統一或民族差别的程度也无从談起。但是这并不排除尼洛特人在良好的条件下可以形成为統一的民族。

帝国主义瓜分非洲以后，阿占德人被分在了三个殖民地內：比属剛果50万人，东苏丹23万人，法属赤道非洲5万人。他們总共有100万人。

1956年1月，由于苏丹和埃及各族向英国帝国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爭，成立了苏丹共和国。它包括了过去殖民地的全部領土。因此共和国居民的民族成分也象过去殖民地时期那样複杂。

共和国北部的阿拉伯居民，是共和国全部居民中最发达的一部分。早在19世紀，苏丹北部就形成了北苏丹部族。現在可以說已經有了北苏丹民族。反之，共和国南部的尼洛特人各族，仍然是非洲的一些最落后的部族。因此在国家建設初期，共和国南部各地区国家机关的大部分工作者都是阿拉伯人，这是很自然的。軍队的軍官也是由阿拉伯人充当。阿拉伯語言，是共和国的国語。在实行民族平等原則的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这种情况不会引起特殊的困难。但是，在有对抗性阶級存在的社会中，情况就複杂了。尼洛特人的氏族部落上层，在帝国主义代理人的煽动下，企图使南北对立，即用尼洛特人反对阿拉伯人。在1955年共和国成立的前夜，南部各地区发生了騷动，直到今天为止，混乱状态还是此伏彼起。南苏丹自由党要求南部地区自治，并把苏丹共和国改为联邦制国家。所有这些都向年輕的共和国政府提出了严重的問題。这就需要共和国政府在政治上采取更多的英明机智的措施，来确立南方和北方各族之間的和平友好关系。

不久以前，即1957年3月，原英国殖民地黃金海岸宣布独立。于是在非洲的地图上又出現了一个新的非洲国家——“加納”。英国殖民地黃金海岸的边界，也同东苏丹的边界一样，都是在帝国主义瓜分非洲以后确定的，这种边界与民族界限沒有絲毫关系。住在黃金海岸北部的各族，操莫西語；住在南部的是阿坎族，他們的語言属于几內亚語族或克瓦語族；有一部分阿坎人住在与黃金海岸毗連的法国殖民地象牙海岸。还沒有形成阿坎人統一的文学語言。就是在加納的阿坎人聚居的地方，阿坎語也还沒成为民族語言；方言的差别尙沒有消失。語



苏丹各族的分布：1.阿坎人（阿散蒂人，梵蒂人等）；2.埃維人（和封人）；3.約魯巴人；4.比尼人；5.伊博人；6.努俾人；7.克魯人（柏特人，巴古維人等）；8.曼丁戈人；9.孟德人，克彼列人，苏苏人等；10.富尔貝人；11.沃洛夫人；12.克西人，屯尼人等；13.圣盖人；14.莫西人（達岡巴人，楠坎塞人）；15.格魯西人；16.洛比多岡人；17.塞努伏人；18.固尔馬人；19.巴尔巴人；20.蒂伏人；21.伊比比奥——埃菲克人；22.卡努里人和蒂布人；23.哈烏沙人；24.图阿列格人；25.西撒哈拉的阿拉巴人；26.苏丹其他各族；27民族成分混杂的地区。

言学家分出了特維方言群或特維語，操特維語的不少于100万人；还分出了梵蒂語，操梵蒂語的約有50万人。黃金海岸的西南部居住着埃維人。当殖民制度灭亡的前途已經确定了的时侯，在組織独立国家的問題上又出現了严重的分岐。阿散蒂人的封建主主張：或是把阿散蒂王国分出来，单独建立独立的国家，也就是說把黃金海岸分成許多小国；或是把加納变成联邦制国家。北部地区的封建上层也主張：或是把北部地区分出单建独立国家，或是使北部地区在加納范圍內实行自治。

由于黃金海岸之宣布独立，接着便出現了英属多哥（其南部住着埃維人）命运的問題。1956年5月，联合国托管委員会在英属多哥进行了全民投票。在多哥人民面前出現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或是保存托管制度，或是与黃金海岸合并，后者可使他們取得独立。英属多哥的大多数居民，主張与黃金海岸合并。但是，在埃維人聚居的南部地区，大多数居民則反对合并。第十一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关于取消托管制度并使英属多哥并入加納的决議。这时，圍繞着加納国家結构的問題展开了斗爭，要中央集权的国家还是要联邦制的国家呢？这一斗爭进行得十分尖銳。阿散蒂、北部領土和埃維人居住区的一切政党，在“民族解放运动”的名称下建立了一个联盟。这个联盟坚决地主張把加納改成联邦制国家，否則它将采取坚决不合作态度。1956年，这个联盟的領袖之一布西厄教授飞到了倫敦，請求英国当局在加納沒有接授建立联邦制国家的建議以前不要給予加納独立。当时問題是这样解决的：加納仍然是中央集权国家，但把整个国家分成为五个省：即北部領土（包括多哥北部），阿散蒂，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和特兰斯—伏尔塔地区（包括多哥南部）。在每个省內都成立了几个类似地方議会的机关。由此可見，加納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产生了。現在，在加納政府的面前摆着一个複杂的任务，这就是制定适当的民族政策，訂立一个保証各族和平相处的暫行条例。

在不久将获得独立的尼日利亚，这个問題更为複杂。一般說来，西苏丹各个殖民地居民的民族成分是非常複杂的。如果我們打开西苏丹的自然地图看一看，就会发現气候和植物地带的界限是从西向东伸展的：即热带森林带，稀林草原带，乾燥草原带。民族界限基本上，当然只能說是基本上，与这些气候和植物地带相符合。然而殖民地的界限，毫无例外地完全是由北往南伸展的，把大块的民族地区划得支离破碎。这样一来，曼丁戈族的几百万人被划到了塞內加尔，法属几內亚，法属苏丹，象牙海岸，岡比亚，塞拉勒窩內，葡属几內亚和利比里亚各地。

尼日利亚被划分为三部，即北部、西部和东部。在北尼日利亚（人口有1,780万人），主要居民是哈烏沙人。可是他們只占全部居民的32%。此外，在这里还有富尔貝人，卡努里人，約魯巴人，努俾人等。在西尼日利亚（人口有640万人），主要居民是約魯巴人。可是在这里除了約魯巴人外，还住有埃多人和伊博人。东尼日利亚（750万人）的主要居民是伊博人。可是他們也不是这里的唯一居民，除他們外这里还住有伊比比奥人。

在政治关系上，現在的尼日利亚是由三个国家，即北、西、东三个尼日利亚組成的联邦。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議会和政府；此外还有共同的联邦議会和联邦政府。尼日利亚在取得独立以后是实行联邦制呢？还是建立三个独立的国家或数个独立的小国呢？关于这个問題几年来一直进行着激烈的斗爭。

到1960年，意属索馬里兰的托管期将滿，那时索馬里兰应当取得独立。可是除了意属索馬里兰以外，在英属和法属索馬里兰以及在埃塞俄比亚东南部也住有索馬里兰人。現在，索馬里兰人已經提出了消除殖民界限并成立統一索馬里兰国家的問題。

这样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我們在撒哈拉大沙漠以南的任何地方几乎都可看到这样的情形。

斯大林曾經写道：在帝国主义时代，民族問題就由“国內的問題变成国际的問題”。这个論点过去和現在都是正确的。可是在非洲我們所看到的却有些不同。在非洲，民族問題一产生就是国家之間的問題，是宗立国与殖民地之間、帝国主义列强与被压迫民族之間的关系問題。是不是說随着殖民制度的消灭和殖民地的独立这个問題便可以勾銷呢？不行，不可以勾銷。年輕的独立国家，今天在經济上仍然受着外国壟断組織的奴役，壟断組織不可避免地也要力图对这些国家政府的政策施加压力。帝国主义国家給予这些年輕国家所需要的經济援助，但是要以这些国家在政治上的让步为先决条件。他們通过吸收这些国家加入自己的軍事集团的办法，

极力来限制这些国家的主权。可見，在这些新生的国家面前，还摆着十分困难的任务：这就是消除經济上依賴状态，巩固主权，防止各种各样的殖民主义的侵襲。

由此可見，民族問題作为国家之間的問題并没有勾銷，而与此同时，民族問題作为国家內部的問題却获得了重大的、可以說是头等的意义。

所有这些在殖民体系崩潰时代具有非常現实意义的問題，也就决定了我們研究非洲民族成分的方向和任务。必須要制定出非洲大陆的精确的民族分布图，标明眞实存在的民族地域，他們联合为部族和民族的程度，他們的分布情况，殖民界限与民族界限的对比，每个殖民地的民族成分以及各个大民族分布区的民族成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这样的民族分布图。关于南非联邦、罗得西亚、尼亚薩兰和怯尼亚的民族成分，多少倒有点研究。

研究非洲各国的民族成分，感到困难的是非洲的語言没有一个公認的科学的分类。語言的分类很多，因此产生一种印象，每一个語言分类的学者都极力使自己的分类分得多些，複杂些。乔斯頓計算出班图人共有226种語言。旺布尔克只是在比属剛果就“发現了”518种語言，方言还不包括在內。在苏丹共計有700—800种語言。所有这些都与事实相差很远。語言学家們显然是把語言分多了，他們把方言甚至把土語都說成是单独一种語言。西歐的和美国的語言学家不管愿意或不愿意这样作（問題不在个人愿望，而在客观效果），他們是在完成殖民主义者的社会定貨，帮助殖民主义者实現为进步人类所唾弃的政策。正是殖民主义者希望把非洲說成是一个“民族成分杂乱不堪”的大陆。

現在，我們回过头来再談談阿坎人的語言。曾經有不少的語言学家研究过这种語言，但是他們都把阿坎語說成是一个独立的語族。我們就拿阿薩毛阿在“非洲”杂志（1955年1月号）上所发表的題为“黃金海岸教育中的語言問題”一文来說吧。阿薩毛阿写道：“在分类上被分为两种不同語言的特維語和梵蒂語，很显然是一种相同的語言。一个操特維語的人，不費多大的困难就懂得操梵蒂語的人講的甚么，反之亦然。与其說是在詞汇和語法結构上有差别，不如說是在发音上有差别……梵蒂人和特維人之間的眞正篱笆，不是語言上的，而是政治上的”。在阿坎人分布的地区內，有几个小封建公国，每个封建王公都傾向于独立，因而把自己公国的方言說成是一种独立的語言。阿薩毛阿写道：“須要在政治上采取不少英明机智的措施，来拆除这个篱笆”。这种情况不仅在黃金海岸，而且在其他更多的殖民地中都可看到。

近几年来，我們在非洲很多地方可以看到爭取統一部落方言和建立統一文学語言的运动。阿薩毛阿主張首先把阿坎語当作全国学校教学用的語言，然后再逐漸地把他变为民族語言（“語言是人民精神的反映”——阿薩毛阿写道）。在利奥波尔德維尔（比属剛果）有一个文化协会，它的任务就是要把吉剛果語变为巴剛果人的民族語言。在南非联邦，由于班图教师协会的发起，老早就开始了創立統一的苏托文学語言的工作。也还有人建議統一科沙語和祖魯語的书法和教科书。这一运动是非洲各族人民民族自覚增长的鮮明标志。

十分明显，現有的語言学家的分类根本不符合眞实情况，应当加以批判，然后根据各族人民之間的眞实联系，即語言、文化及历史的联系，創立科学的分类。但是，这是語言学家的事。目前民族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任务，在于研究非洲各国所发生的民族学的实际过程。战后时期，我們看到非洲不論在經济方面或是在社会关系方面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随着采矿工业和种植場經济的增长而来的，是城市和矿区中心人口的增多，是文化和民族自覚的高漲。老早就已开始的民族形成过程，現在具有了异常迅速的速度。忽視这些过程，只靠現有的語言分类来說明非洲民族成分的任何企图，都是白費的。因为它所反映的不是現代非洲的民族成分而只是关于非洲語言的科学研究的状况。

今天，不仅非洲的政治地图有了变化，就是民族分布图也有了变化。过去的部落星散状态一去不复返，而让位于民族共同体。不过，政治界限与民族界限的不一致，还在严重地阻碍着民族形成的过程，複杂化了各族間的关系，使民族問題变成了急待解决的尖銳問題。

（任君譯，原載“苏联民族学”雜志1957年第4期）

人們共同体*

中央民族学院苏联专家 Н·Н·切博克沙羅夫
И·О·切博克沙羅娃

人們共同体(этническая общность)——是人們在历史上在一定地域內形成起来的并具有語言、經济和文化特点的群体。"этнический"一詞，来自希腊文的"этнос"，这个詞在意思上相当于俄文的"народ"。"народ"所指的，也是具有一定的形成地域，具有自己的語言和独特的經济文化特点的人們共同体。不过，需要注意：在俄文里，"народ"一詞，同时还用于另外一些意义，用以表示广大的劳动群众，表示一般的大量的人們，表示某个国家的全体公民。例如：全体劳动人民都拥护共产党；参加游行的有許多人；苏联人民为争取世界和平而斗争。在这些場合，"народ"一詞指的都不是人們共同体。大家注意，下面的例句就不同了，其中"народ"指的就是人們共同体。例如：普希金是俄罗斯人民的偉大詩人；汉族人民創造了丰富的高度的文化；維吾尔人民的歌舞在中国非常受人欢迎。

但是，要把"Этническая общность"和"народ"这两个概念完全等同起来，还是不行的。前一个概念比后一个概念要广泛得多。因为，我們可以称之为"Этническая общность"的，不仅是各个单独的"народ"，而且可以是一群血緣相近的"народы"，或者是某个"народ"中具有某种語言特点和文化特点的分支。例如：俄罗斯人，当然是一个"Этническая общность"；同时，全体斯拉夫人，也可以算做是一个"этническая общность"，因为他們也是在一定的地域上，在維斯拉河与德聶伯河流域形成起来的，他們在語言和文化上具有許多相似的特点。此外，象俄罗斯人中間的一个地方群体——居住在白海沿岸的波莫尔人，同样也可以称为"Этническая общность"。波莫尔人是俄罗斯人的一部分，不过，他們講的是俄罗斯語的北部方言，在民族学上具有显著的特点。

同样，汉族无疑地也是一个"Этнинеская общность"；而且，整个汉藏語系的各族人民一起，又可以算做是一个更大的"Этническая общность"；汉族人中間的地方群体"客家"，则算做一个較小的"тническая общность"。

人們共同体（Этническая общность），在各个历史时代也各各不同。最早的形式，即原始公社时代所特有的形式，是氏族和部落（род и племя）。

氏族是起源于共同祖先的人群。氏族的全体成員都認为彼此是有血緣联系的。"氏族"一詞，在俄語以及其他語言中，起初的意思，都是表示"共同起源""共同血緣"。这是整个原始公社时代最重要的概念。

---

* "Этническая общность"一語，暫譯"人們共同体"。關于"人們共同体"有一些术語，如：род（氏族）、племя（部落）、народность ил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部族）、нация（民族），以及народ（族）、этническая группа（族体）、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ая группа（族支）、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группа（客族〔客藉族体〕）等等，我們对它們的概念了解得不夠清楚，因而在翻譯上也碰到很大困难，现在，特請苏联民族学专家切博克沙罗夫教授对这幾个术語作了一些解释，一方面帮助讀者了解它們的含义，同時希望讀者对这些术語的譯法提出意見。——編者

关于最早氏族产生的問題，是一个难題，在科学上尙未得到解决。在这里，主要的困难是在于：最早的氏族沒有保留到我們今天，就是在世界上最落后的民族中間，比如在塔斯馬尼亚人和澳大利亚人中間，我們也見不到这样的氏族了。

苏联大多数学者根据各种間接材料提出了推断，認为氏族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就已存在，毫无疑問，氏族的形成是跟外婚制和两合組織的出現联系着的。

关于氏族語言的問題，也是一个难以解决的問題。自从斯大林同志发表了“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提及氏族語言之后，苏联有許多学者（托尔斯托夫、布齐諾夫等人），便开始在世界上最落后的各族（如澳大利亚人和巴布亚人）中間寻找氏族語言的残余現象。他們提出了一种推断，認为曾經有过这么一个时候：每个氏族都占据着一定的地域，每个氏族都是独立的单位。如果实际情况确是如此，那末，氏族語言的存在是完全可能的。另外一些学者（如柯斯文），則反对这种假設，認为氏族从来也不是独立的經济单位。这个問題尙在爭論，还要求进一步探討。

在历史上，氏族之后便是部落。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指出了部落的基本特征。每一个部落都有：自己的名称、自己的地域、独特的方言、一定的文化特点、风俗习慣和崇拜仪式。随着部落的发展，出現了解决公共事务的部落会議，稍后，出現了部落首領（酋长），部落首領通常也就是祭司。

关于部落产生的时間問題，現在也未得到解决。現代为民族学家所研究的各族人民，全都經过了部落阶段。澳大利亚人和塔斯馬尼亚人也都有了部落区分，后者在社会經济发展水平上相当于中石器时代。因此，許多学者認为，中石器时代可能正是最早部落形成的时代。部落形成的途徑，可以是由相邻而居，彼此在經济和婚姻关系上非常密切的几个氏族联合而成，也可以是由一个大氏族发展分裂而成。部落也同氏族一样，存在于整个原始公社时代。在古代中国，曾經有过夏、商（殷）、周等等部落。在东斯拉夫人中間，曾經有过波里人、德列夫里人、德列戈維奇人、維亚季奇人、克里維奇人等等部落。在古代日耳曼人中間，曾經有过法兰克人、盎格魯人、丹尼人、瑞維人、巴瓦尔人、撒克逊人等等部落。

在原始公社时代末期，在过渡到阶級社会的前夕，出現了巨大的部落联盟，通常都有複杂的組織。摩尔根和恩格斯很好地描述了易洛魁人的部落联盟。在古代中国，可能也存在过夏、商（殷）、周部落联盟。苏联許多学者（雷巴科夫、特列齐雅科夫等）認为古代罗斯，最初也是一个部落联盟。

氏族和部落，始終都是建立在血緣基础之上的。在原始公社时代，在氏族部落內部，只有个人財产，而无私有財产，也沒有阶級分化。只是到了末期，氏族部落內部，才发生了財产不平等，出現了氏族部落貴族。氏族部落貴族到后来便成为了奴隶主或封建主阶級形成的基础。

在阶級社会里，氏族和部落逐漸失去了自己原来作为人类地域經济单位的意义。但是，它們在亲族計算、家庭关系和生活方式上还能长期保存下来。氏族部落区分在游牧民中間，例如在蒙古人、哈薩克人、柯尔克兹人中間，保持得特别久。

随着阶級社会（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的发展，形成了一种新型的人們共同体，在苏联科学著作中通常称做“部族”（народность）。部族也象其它一切人們共同体一样，具有一定的形成地域，有自己的語言和經济文化特点。部族与氏族部落的主要区别，就在于部族不是以血緣为基础的，而是以地域比邻为基础的。如果說部落所特有的是氏族公社（родовая община），那末，部族所特有的則是比邻公社或农村公社（соседская община или селькая община）。加入这种公社的人，并不是根据血緣的特征，而是根据共同生活与共同經营的特征結合起来的。因为部族形成于阶級社会，所以它始終是由不同阶級成分組成的，彼此之間經常进行着阶級斗爭。部族內部的两个主要的对抗阶級，在奴隶制时代是奴隶主和奴隶，在封建时代是封建主和农奴。

部族的形成，通常都是在从原始公社制度向早期阶級社会过渡的时期，它是由不同的部落結合起来的，这些部落之間可能有血緣关系，也可能沒有血緣关系。例如：在古代汉部族中間，除包括有古代夏、商、周等部落的后代以外，还有其他部落如泰、苗、瑤等等成分加入了进来。同样，古罗斯部族也是由許多血緣相近的东斯拉夫部落，以及許多与他們沒有血緣关系的芬兰、烏戈尔、突厥等等部

落集团所組成的。

在这里，应当注意：在俄語中“народность”一詞的意义与“народ”有所不同。“народность”（部族）是一定时代的人們共同体的名称；而“народ”，我們知道，它有时是表示一般的巨大的人們共同体，有时则表示劳动群众或大量的人們。当然，一切“народность”都是“народ”，但是并非所有的“народ”都可以叫做“народность”。例如，俄罗斯人和汉人，在我們今天就不能称他們为“народность”（部族），因为他們早已形成了另一种类型的人們共同体——“нация”（民族）。但是，不論俄罗斯人或汉人无疑地都是“народ”。

在俄語里，与“народность”一詞同时运用的还有“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这两个詞通常用来表示同一概念——即在“нация”形成之前的人們共同体。斯大林同志在自己关于民族問題的著作中就是把这两个詞用于同一个意义的，有时可以互相代替。不过，在具体的行政工作中，例如在填发公民証、填写各种証件的时候，“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一詞的意思就是“民族成分”，而不管究竟是什么类型的人們共同体。在苏联公民証“民族成分”这一栏里，可以填写俄罗斯人、犹太人、哈薩克人，也可以填写赫哲人、楚克奇人以及其他等等。

随着資本主义的发展，形成了新型的人們共同体——“нация”（民族）。在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中，对民族作了充分的描述。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地域、自己的語言和自己的文化特点。在这方面，“нация”与以前的人們共同体的。然而，除了这三个特征以外，“нация”还具有另外一个特征——共同的經济生活，各部分之間的經济联系。这种共同的經济生活，只有当国內民族市場已經形成、該民族各个地区之間的商业交換已經发展起来的时候才有可能。

列宁指出，在俄国，全民族的內部市場在17世紀中叶已开始形成；苏联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認为俄罗斯民族的形成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中国許多历史学家認为：在中国，类似的条件（資本主义因素的产生、全中国內部市場的开始形成等等）早在明代（14—17世紀）就已存在。由此可見，“нация”是在长时期內逐漸形成起来的。这一过程发端于封建时代，当时資本主义結构剛剛产生，尙不是居統治地位的生产方式。

随着資产阶級民族的发展，民族內部两个对抗阶級：資产級阶和无产級阶之間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銳了。列宁指出：在每个資产阶級民族內部都存在有两种民族文化——反动的地主資产阶級的文化和进步的人民民主的文化。

最早，資产阶級民族是在資本主义的发展和封建主义的灭亡开始得較早較快的地方形成起来的。例如，最先是在荷兰和英国（16—17世紀），稍后是在法国，后来，遍及歐洲其他国家。斯大林同志指出，民族的形成有两条主要的道路：在一些国家里，資本主义发展比較迅速，民族形成过程同时也就是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例如，西歐大多数国家：英国、法国、以及后来的德国、意大利，情形就是如此；在另一些国家里，长期保持着封建官僚的国家机器，只有一个民族成为了統治民族，而其他部族則是在民族压迫和不平等的条件下、在頑强的民族解放斗爭中形成为民族，例如，在沙皇俄国、奥匈帝国和爱尔兰，情形就是如此：在沙皇俄国居統治地位的是俄罗斯人，在奥匈帝国掌握政权的是德意志人和部分的匈牙利人，在爱尔兰压迫别人的是英吉利人。在这些国家里，在民族压迫的条件下，形成了以下民族：波兰人、立陶宛人、拉脫維亚人、爱沙尼亚人、芬兰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克罗特人、斯洛文人、爱尔兰人以及其他等等。

在帝国主义时代，民族結合的过程（即部族結合为民族的过程）已遍及于亚洲、美洲以及非洲的許多国家。在这个时代，形成了許多巨大的民族，如汉民族、印度尼西亚民族、埃及民族以及其他等等。在殖民地和附属国，民族結合的过程通常都是在残酷的民族解放斗爭中进行的。

偉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在苏联开始了将資产阶級民族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民族的过程。这些新型民族不同于資产阶級民族的地方，首先就表現在自己的阶級結构上：新型民族基本上是由工人和农民两个友好的阶級組成的。在社会主义民族內部，已逐漸結束了資产阶級民族所特有的两种文化的状况，慢慢形成統一的民族形式和社会主义內容的文化。同时，在社会主义民族內部，在工人、农民与其他社会阶层之間尙保存着一定的矛盾，在他們之間也还有一定的文化和生活上的差异。但是，这些矛盾并不带有对抗的性質，可以用和平的方法求得解决。毛泽东同志在“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

盾”的著名講話中已为中国指出了这条道路。随着这些矛盾的解决，工人与农民之間、城市与乡村之間、智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間、領导与被領导之間的文化和生活上的差异也将会逐漸消失。

沙皇俄国有許多部族，甚至部落集团，在十月革命以前没有来得及形成为民族；可是，到苏維埃时代；他們走上了非資本主义发展道路，直接形成了社会主义民族。例如，哈薩克人、柯尔克孜人、土尔克明人、布里亚特人、雅庫特人、以及其他等等，情形就是这样。但是，在苏联，就是在苏維埃时代，也并不是所有的部族全都形成了社会主义民族。有許多部族，通常都是人数比較少而居住在其他較大的民族之間，虽然他們也得到了在社会經济和文化上自由发展的充分可能，但未能形成为独立的民族。例如，苏联极北方的大多数各族人民、維吾尔人、东干人（回族）以及中亚其他許多少数民族，情形就是这样。这样一些人們共同体，在苏联科学著作中有时称做“社会主义部族”（“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народность”或“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

自1921年，蒙古人民也走上了非資本主义发展道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走上社会主义建設道路的，又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以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各族人民。在所有这些国家里，都开始了社会主义民族形成的过程。

最后，在結束与人們共同体有关的术語問題时，还应当談談“Этническая группа”、“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ая группа”、“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группа”这三个术語的意义。

“Этническая группа”（族体）——通常指的是不大的人們共同体，它是某个大族的一部分，但本身具有語言和文化的特点。在这种意义上，我們可以把俄罗斯民族中間的波莫尔人称做“Этническая группа”，同样，也可以把汉族中間的“客家”称做“Этническая группа”。

同时，“Этническая группа”也可以用以表示一群人們共同体，如一群易洛魁部落，或一群东斯拉夫部落等等。由此可見，“Этническая группа”并没有什么严格确定的意义，可以用于不同的場合。

“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ая группа”（族支）——通常指的是某个民族的地方集团，它具有文化生活上的特征（即民族学上的特征）。这个术語与“Этническая группа”很是相近。不过，它比后者的意义要确定一些，主要只注意文化和生活上的特点（即民族学上的特点）。作为例子的，在俄罗斯民族中間，同样还可以举出波莫尔人，此外还有哥薩克、信仰旧教的喀尔查克人、以及西伯利亚的斯塔罗日雷人等等。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группа”（客族〔客藉族体〕），通常指的是某个民族或部族的一部分人，他們住在国外，或者一般講来是住在远离自己祖籍的地方。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группа常常是与其他民族交錯地住在一起，而没有一定的民族地域。在苏联可以举出希腊人、阿尔巴尼亚人、保加利亚人、亚述人，他們都是在不同时期从相应的国家里迁居而来的。

（茹子牛譯）

湼湼茨人（上接49頁）

同过去一样，湼湼茨人的主要經济部門是养鹿业。由于动物馴飼者和兽医的帮助，鹿群的飼养技术和生殖率提高了。有許多集体鹿場还兼到海上、湖中、河里去捕魚、到山林去打猎并飼养野兽。新的經济各部門农业（园艺业）和养畜业发展了起来。居民的生活富裕了。出现了百万富翁集体鹿場。湼湼茨人的文化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屋里。人們已普遍穿城市式样的衣服，但使服装保留了很适合当地气候条件的民族特点（特别是冬天的服装）。湼湼茨人享受到了設备完善的医疗帮助。由于物質生活的改善，由于对湼湼茨人整个生活的彻底改造，人口生殖率增加了，过去很高的人口死亡率（尤其是小儿）减底了。在沙皇俄国时代，所有的湼湼茨人都时带着畜群放牧的只有牧人。其他的湼湼茨人都定居在木造的房是文盲。在苏維埃政权下，創造了湼湼茨語文字，实行了用本族語言进行教学的普及教育，很多湼湼茨人都入了中等专业学校和高等学校。出现了民族知識界如作家、艺术家、教育家和各个經济部門的专家。湼湼茨人的民間口头創作多采用叙事詩、童話、謎語、歌謠的形式，民間技术有刺綉、花边、木彫和骨刻。

（佳子譯自“苏联大百科全書”第29卷）

俄国和苏联文献中有关东干族起源的問題

Г·Г·斯特拉塔諾維奇●

中国5亿（应为6亿）居民，按民族成分来說是不一样的。为数較多的群众(90%以上)是“汉”，“汉人”。中国非汉族的居民平均占全国居民的十四分之一。其中有小的民族群体（例如“山头”—15万人）和大的部族（例如“諾苏”或彝族 250万人以上；維吾尔人300万人以上及其他等族）。

中国最大部族之一是东干人。据我們的計算，他們的总人数达 7、8 百万人之多。他們分布于从喀什噶尔城到北京的大道上；主要集中于甘肃、陕西和新疆等省（中国西北）。东干人大規模迁徙到四川（成都）、青海、山东以及东北（19世紀）。革命前俄国和苏联文献里所采用的他們习用的名称是“东干人”，但不是到处通用的。这一名称常常流行于苏联中亚細亚各共和国境內（东干人是在公元1861—1828年起义后迁到这里来的），部分流行于新疆省（伊犁河流域）和东北。有人認为东干不是自称，而是邻族（中亚細亚各民族）給某一支东干人起的名称。他們的汉文名称自称是“老回回”，或者簡单地叫做“回回”（伊斯兰教徒）。“回回”这一名詞广泛地見于中国的历史文献和民族学文献中。中国傳統的民族学文献把中国的居民分为五大类：“汉”或“中”（中国人），“蒙”（蒙古人），“滿”（滿洲人），“藏”（西藏人）和“回”（字面上是伊斯兰教徒）。

“伊斯兰教徒”这一个专用名詞和其他民族专用名詞（汉人、西藏人、滿洲人、蒙古人）并列，其不确切的地方是很明显的了。这里是以宗教的归属作为一种决定要素代替民族的名称而出現的。把以下語言和文化各不相同的民族如操突厥語的維吾尔人、哈薩克人、烏兹别克人，操蒙古語的东乡人以及語言与汉族相近的东干人和 пантай 等等列入“回”这一类中，显然是不正确的。

中国历史学家林干发表了一篇論文（“試論回回民族的来源及其形成”，載“新建設”杂志1952年2月号和3月号—譯者），其第一个目的是要指出，在中国文献和官方文件中流行1,200年以上的“回回”这个专用名詞是具有两种意义的：（一）中国的伊斯兰教徒（其中包括維吾尔人、哈薩克人、柯尔克孜人、东干人、塔塔尔人、撒拉人等等以及信奉伊斯兰教的汉人；（二）东干人，他們是个别的、独立的历史上形成的民族集团，据作者的意見他們已形成为一个現代民族了。

作者的第二个目的是在研討和批評在中国流行而与作者所做的假定相对立的东干人起源的学說。这篇論文在这一方面对于苏联的所有民族学家和历史学家是有很大兴趣的。作者的观点是很明显的：东干族是複杂的长期的民族发展过程的結果。东干族的基础是由操伊兰語和阿拉伯語的来自前亚細亚的移民构成的，时間是从接受整个中国語言、文字和文化时开始的。东干族的主要經济是农业和商业。他們在地域上是被分开的，可是在每个公社中內部的联系都是异常巩固的。据作者的意見，宗教信仰的执着（一方面是东干族本身的，另一方面是压迫他們的滿洲政权的）和东干族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在这內部团結上起了很大的作用。据作者的意見，这种团結就是东干人已經形成为現代民族（正是現代民族，而不是部族）的根本标志。

在結語时，作者号召东干学家对于东干族起源的問題和关于他的（林干的）观点发表自己的意見。他說：“我抱着抛磚引玉的动机”。我們不要求把自己的意見看成为在动机中所表示的那种玉，但也不应該把它們看成是“錦上添花”。

● 作者去年曾来北京中央民族学院訪問，并作过学术報告。本文写于1954年，人口数字的材料，只可作参考。

在俄国和苏联东干学中曾屡次提出关于东干族起源的問題。显然，关于1861—1878年中国西北伊斯兰教徒起义时期的問題最初引起了社会上的注意。还在A·K·盖恩斯在1866年俄国地理学会会議上宣讀的报告“論中国西部的回民或东干族的起义”中，他就曾引用流行于中亚各族人民和东干人之間有关东干族起源傳說的异文之一。这个傳說的所有异文都一致肯定說，东干族的祖先是外来人，他們認为东干族是“留下”或、“返回”❶的后裔。在盖恩斯所指的异說中提到，鉄木儿軍队的士兵經过桑塔什（直譯为“算石”）山隘向东推进时，为計算自己的人数起見，每个士兵都得把一块石头放在一座金字塔里面。当軍队回来时每一战士都从金字塔中拿出一块石头。当地留下了3,000块以上的石头。这就意味着在东方留下了3,000多名战士。他們組成了第一批中国东干人的駐軍。后来成为崇信伊斯兰教的汉人和最初移民的后代。有趣的是，这个傳說跟我所笔录的傳說中异文情节的发展几乎是完全一样的，那是我在1943年从塔什干（貴柳克附近）“祖国”集体农庄村鎮的老庄員尤苏波夫的口述笔录的。在柯尔克孜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伏龙芝省的东干人間流行着关于伊斯兰教的信奉者阿拉伯人的傳說，即他們从塞依德·阿里·瓦哈斯向东推移，并在中国留下了3000名战士，这些战士和中国女人結婚，这样便开始有了东干人，据說，因此东干人便叫中国人为“舅舅”。文献上这一傳說被記載到苏来曼·沙里夫的“东干族的历史”中，这部历史即根据1927年塔什干东干族的資料出版的。很有可能，这只是較早的出版物的轉載（或者是口头上的轉述）。在吳魯别尔教授1942年在亚历山大罗夫斯克村庄所記录的异文中說，阿拉伯人奉唐代皇帝（李世民）之召来到中国，李世民在梦中彷彿看見了青獅子（尙武的伊斯兰教的象征）战胜了白象（佛教南派的象征）。当时太宗征求了300名獅子国的战士来交換300名的中国弓弩手。后者好象迁徙到了巴格达，在那里“至今还有”中国—阿拉伯移民区。阿拉伯人或者波斯人就开始成为东干部族了。这个傳說无疑地是有事实根据的。因为正是太宗把由中亚的突厥人、維吾尔人和波斯人組成的警卫队編入中国軍队之內。（在俄国汉学家帕拉提的文献中指出了中国在明代由波斯人組成的警卫队）。

上引傳說的异文多少是个完全的轉述，我們可在波果亚夫倫斯基、考夫曼、捷連斋耶夫的（虽然他的主要看法認为东干族就是东甘肃人，全部出于甘肃省）著作中，后来在許多苏联作者的著作中，有时在东干学中找到。

上面提到的盖恩斯的报告也引用了东干人起源于“回鶻”即維吾尔的意見。这最初見于查哈罗夫“关于东干族起源札記”的专論，其后为里赫特戈芬、藍斯德尔和其他学者所支持，但現在为林干正确地拼弃了。

关于东干人起源最具兴趣的假定，是上面已經提到的俄国汉学家帕拉季依（卡法罗夫）所主張的和后来为Г·Б·格魯莫一格尔日迈洛所支持的假定，即認为东干族就是那些成吉思汗所迁徙的“从土耳其斯坦到中国的費尔干人的后代”和剪羊毛的手工业者的成吉思汗后代（据格魯莫一格尔日迈洛的意見是撒馬尔罕、布哈拉和其他土倫—伊兰西部城市的人）。可以說，这一起源的假定后来吸引了許多作者的注意和为“伊斯兰世界年鉴”所正式采納了，东干族的祖先的确是出身于塞拉赫斯城（麻里兀附近）。后者确是实在的，但不是对于东干人說的。出身自塞拉赫斯城的是住在甘肃和青海省的和东干人有联系的撒拉人。

在苏联文献中，关于东干族起源的問題还未获得解决。象已經提到的，偶而述及东干族的作者或承認他們是信仰伊斯兰教的汉人或承認他們是在汉人的周圍接受汉人文化与語言的突厥人。东干族起源于汉人移民者的学說，（这些移民者早在公元前第2世紀已在中国西北的操突厥語的人們中定居下来），最初由苏联民族学家和考古学家С·П·托尔斯托夫教授科学地論証了。大致上主張相同意見的是根据人类学的資料来作論証的苏联人类学家М·Г·列文。东干人、历史学碩士Х·Ю·尤苏罗夫在采用族名发音的比較方法时，認为东干人是唐代定居于中国西北的藏族集团吐谷渾的后裔。

应該指出，藉对“东干”或“回回”这两字发音上的說明或其符合（其他民族的族名）之助而求解决問題者已不止一次地为俄国的、其后为苏联的文献所提出了。东干的名称与維吾尔的族名发音上

❶ 兩个族名的翻譯是（一）“东干”即“土尔干”，是突厥動詞“吐尔莫克”（турмок）的形動詞式，意为停下、等待、留下；（二）“回回”，按汉字“回”的意义之一为返回。

符合的探索（查哈罗夫等人）把他們算是“留下”的（盖恩斯等人），“突厥农民”（来自“ту”十“иганъ”，吳鲁别尔将其譯为“土地的人們”），出身于甘肃省或敦煌城（捷連齐耶夫）的人等等尝試就是这样的。但是这一方法如果看作是解决問題的唯一滿意的方法，这自然什么也不能达到。在这种情况下，尤苏罗夫的假定获得了人类学資料的部分証明。这种資料指出东干族可能起源于西藏人或蒙古人的一种（切波克沙罗夫㊀）。整个地說来，东干族在人类学上是北方中国人类型的变种（馬采耶夫斯基、波利亚科夫、切波克沙罗夫、列文和捷别茨），伊犁的东干人可能是維吾尔人的一支（列文）。

本文作者运用了中国西北历史的資料，民族名称发音上的一致和历史文化比較的資料以后便提出了东干族起源于契丹，更确切地說是起源于契丹国的辽和西辽居民的滿洲部分。这个观点得到了切波克沙罗夫的支持。

要开展苏联东干学的每一个爭論是不可能的，这里只假定說，他們（包括林干在內）都一致認为东干族是民族来源很複杂的民族，但毫无疑問是在現在中国境內和甚至（基本上）是在他們現在居住地上形成起来的一种当地人。苏联的东干学者不承認，也不可能承認东干族是个現代民族（即使由于他們鬆懈的地域联系性），但决不是貶低东干部族（也如世界其他一切部族一样）的民族优点。只有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起，这里的东干族才获得了和国內一切民族平等的权利。在中国西北已有两个东干族的自治区了。这样，在他們面前提供了进一步的民族团結的一切可能性了。

遺憾的是，林干不能充分正确地解釋中国的东干族和伊斯兰教徒并不是一回事。让我再一次講到这个問題。伊斯兰教傳入中国是在不同的时間經由不同的道路的。在中国信奉伊斯兰教的有东干族（700—800万人），維吾尔族（300多万人），пантай（云南伊斯兰教徒达50万人），哈薩克族（350多万人），柯尔克孜族（15万人左右），塔塔尔族，波斯族，达尔特族，蒙古族——“东乡”，“西夏”和其他族人。以及信奉伊斯兰教的汉族（他們的人数未确定）。伊斯兰教傳入中国西部各省最早是在唐朝，即第2世紀到第10世紀。第10世紀到第12世紀伊斯兰教从海道傳入中国（初入广洲后进云南）。伊斯兰教流行于中国西北是和阿森教长有关（穆罕默德阿森为經过立兹教长以后的穆罕默德后裔），他于15世紀末至16世紀初住在布哈拉、撒馬尔罕和喀什噶尔，回曆942年即公元1563年葬于陀赫比德（撒馬尔罕附近）。确切些說，伊斯兰教傳入新疆是和阿森教长的孙子即阿帕克有关的，他的葬地（离撒馬尔罕城6公里的地方）成为中国西北伊斯兰教的圣地。东干人照例是阿森教派的伊斯兰教徒（即阿森教徒），早在16世紀，他們的祖先就信奉伊斯兰教了。可見“老回回”这一个名詞，我們正确的翻譯不是“老伊斯兰教徒”，而是“可敬的”“正統的”伊斯兰教徒。

总之，“中国的伊斯兰教徒”和“东干人”不是同一个意义的。中国西北、北部和东北的东干人，就是“伊斯兰教”民族之一，即伊斯兰教曾在他們中間傳播的民族。在族系上东干人是和云南、广洲两地的伊斯兰教徒沒有血統关系的。移居东北的实际上也主要是东干人。

林干所发表的文章是东干人对于自己民族历史兴趣的日益曾长的最好証明。作者吸收了可靠的历史資料。这篇文章虽然有个别方法論上的缺点和对中国伊斯兰教的問題的提法有些不确切的地方，但它无疑地是有科学兴趣的。

参考材料

1、А·К·盖恩斯：“論中国西部伊斯兰教居民或东干人的起义”，載“俄国地理学会通报”，1866年第2卷第25頁。

2、帕拉提（卡法罗夫）：“論中国的伊斯兰教徒”，載“北京俄国傳教会会員丛刊”，1866年第4卷，第438—440頁。

3、Н·Н·切波克沙罗夫，“东干考察記”，載“苏联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簡报”，1947年第3期第25—26頁。

4、Н·Н·切波克沙罗夫，“北方汉族及其邻人”，1947年莫斯科版，苏联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档案 ф·Р·Д—55/3第769—812頁。

㊀ 現在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講学。——譯者

（罗致平譯，原載“苏联民族学”雜志1954年第1期）

关于社会学家国际协会第三次大会

苏联科学院通訊院士 M·Д·卡瑪利

（一）大会概况

1956年8月下旬，在安姆斯特丹举行了社会学家国际协会第三次大会。苏維埃学者参加大会的工作，这还是第一次。

有57个国家的代表团参加了这次大会的工作，代表总数在550名以上。不过仍有許多国家，例如中国和其他几个东方的国家并不曾派代表出席。代表印度的是原在西歐留学的四名学生，他們没有作什么报告。无待贅言，如果东方各国派来代表的話，那末，这些代表們是会关于入20世紀以来在他們国家中曾經发生或現正发生的重大变迁講出許多有趣味的事情来的。西方各資本主义国家的代表团里面，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家为数甚少，儘管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家曾对有关社会的科学作出极有价值的貢献。除开荷兰代表团，美国代表团的人数最多，其中却連一位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家也没有。代表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家的，主要是各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团，其次，法国和意大利的代表团也有一些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家在內。

从所提出的报告和所发表的演講来看，参加这次大会的代表，絕大多数是应被归属于“經驗主义的”社会学諸流派的。无論就大会的构成来說，或专就苏維埃代表团的构成来說，其中都不但有“純粹的”社会学家，而且也有經济学家，法律学家，文化史专家——这就是說，社会科学的不同专业都有代表出席。

第三次大会的討論主題是“20世紀的社会变迁”。毫无疑問，这一主題有着非常現实的意义。它許可人們对于20世紀中曾經发生或正在发生的最巨大的社会变迁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分析与綜合。

大会在全体会議上听取了一系列的报告，此外，大会也成立了与以下題目有关的几个小組：

1、社会变迁之社会学的研究（开場的討論）。

2、經济結构的变迁。

3、阶級分野的变迁。

4、家庭关系的变迁。

5、教养与教育的变迁。

6、社会变迁中的一般問題。

7、1956年的社会学（不同国家中社会学研究与教学的情况）。

大会开幕后，首先由下記大会的各位組織者致祝詞和开幕詞：霍倫德尔教授（代表尼德兰的社会学家）、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組織的代表，荷兰教育部部长，安姆斯特丹副市长，密西根大学教授会会长罗伯特·恩得里耳。霍倫德尔教授在向参加大会的代表祝賀时，号召进行自由討論，大胆提出問題；他也表达了这样的希望：大会将是有收获的，它会加强社会学家的国际联系。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組織的代表說到：一方是“苏維埃集团”，另方是“西方集团”，他希望双方“就它們之間的衝突加以研究”，藉令紧張局势得到緩和。恩得里耳宣称：“我們需要更多的接触，加强联系，保障和平”。

我們苏維埃代表对于进行自由討論、大胆提出問題、建立足以在各国人民之間巩固和平事业的科学联系和接触的建議，能够完全同意。此外，我們也一直認为：决定討論的不同路綫的并不是什么地理区域的划分，而是不同世界观的对立，不同意識、不同理論以及不同哲学和社会学立場的对立，并且世界观、意識、理論、立場等等，追根究底，还是反映着不同而对立的社会阶級之利益的。但世界观的对立和斗爭并不妨碍各国社会学家互相接触，从接触中得到好处。对立意見、观点和流派之間的斗爭，能把人們的思想磨炼得更加犀利，也能使得眞理与錯誤、科学与各种流行的、未曾經过考驗的主观臆断、錯覚及偏見之間的分水岭更加明显。

有两条主要的路綫，即两种世界观，在大会上

展开了斗爭：馬克思主义的和非馬克思主义的。非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代表資产阶級和小資产阶級思想意識的各种傾向。还有不少的社会学家，談不到一定的、明确的路綫：一面有对于社会变迁給出眞正科学解釋的理論，又一面有在資产阶級社会学中流傳甚广的凭空虛构、矯揉造作、非根据实际材料从而不足以取信的种种解釋，当他們就这些加以选擇的时候，表現了摇摇摆摆。但对苏維埃学者的报告和演講发生了浓厚兴趣的，却也正是这一批社会学家。

苏維埃学者提出了12份报告交大会討論：

1、"二十世紀社会变迁的規律性"，提出人，П·Н·費多謝也夫。

2、"苏联財产所有制的根本变迁"，提出人，А·И·帕什科夫。

3、"財产关系在苏联"，提出人，А·Н·庫兹涅錯夫。

4、"苏联經济与工业組織"，提出人，Н·Н·聶克拉索夫。

5、"苏联的集体农业体系"，提出人，М·И·莫伊謝也夫。

6、"苏联居民阶級构成的变迁"，提出人В·С·聶穆奇諾夫。

7、"苏联民族关系的变迁"，提出人，М·Д·卡瑪利。

8、"社会进步与法律"，提出人，С·ф·克切克揚。

9、"苏联家庭关系的变迁"，提出人，Г·М·斯維尔德洛夫。

10、"苏联中亚細亚諸共和国家庭关系的变迁"，提出人，Х·С·苏列伊曼諾娃。

11、"苏維埃社会中道德的基本原則"，提出人，А·ф·施什金。

12、"苏联国民教育的发展"，提出人，И·А·凱洛夫。

亲身参加大会工作的有П·Н·費多謝也夫（代表团团长），М·Д·卡瑪利，С·ф·克切克揚，А·Н·庫兹涅錯夫，В·С·聶穆奇諾夫，А·М·卢緬采夫，И·С·捷格拉夫（里加），И·С·克拉夫欽科（明斯克），Х·С·苏列伊曼諾娃（塔什干），Н·С·什列帕科夫（基輔）。

（二）"西方"社会學家在大会中的主要報告

让我們首先講一講开場的几份报告。科倫大学已退休的社会学教授П·丰·維兹作了一个报告，題目是"社会变迁之社会学的研究"。报告人特别强調，在我們这社会变迁迅速而深刻的时代里，社会学不可能对社会变迁不加理睬。但丰維兹并不曾对于20世紀的社会变迁进行分析，它宁愿处理一些不太尖銳的問題，如"社会变迁"这一概念本身的变迁、这一概念的历史和根源，"进化"、"进步"、"社会变迁"等詞的区别、以及其他。

报告人从保守的、唯心的观点来了解社会变迁。他認为，能力不灭的定律不但是自然界的、而且也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定律。說到社会变迁的因素的时候，丰·維兹反对一元論的解釋，而傾向于变迁因素的折衷說。报告人宣称："在人类社会生活中，通过制度和組織的建立，人的意志企图在一系列連續不断的过程中間引起突然的变异和暫时的停頓"。这在本質上是唯心論的說法。大家知道，人的意志并不是社会变迁的决定因素；人的意志原是永远被人們的物質生活条件，即被人們生活在其中并在其中发生作用的社会关系、首先是生产关系的总和决定着的。

倫敦大学社会学教授莫利斯·金斯堡关于社会变迁因素的問題作了专題报告。金斯堡把社会变迁一詞了解为"社会結构的变迁，例如与社会的大小、社会各部分的成分或均衡、或社会組織类型有关的諸种变迁"。报告人提出这样的問題：我們追寻变迁的由来，最后認为它們导源于人的愿望或目的，也許导源于未經意識到的个人智慧的刺激，这样認定是否正确呢？如果是正确的話，那末，我們又怎样来解釋"社会力量"？能把社会力量解釋作因个人与个人交相影响遂至改变了形态的个人愿望，或个人意志行为之总和嗎？是不是应当把社会結构的变迁看作是成为原因、发生作用的力量，并認定社会結构的变迁也常引起其他变迁？引致或激起个人智慧的变化，是物質和社会环境的功能嗎？有"功能的"变迁，有取决于人的意識的变迁，二者怎样联系起来呢？

毫无疑义，这些問題既有趣味，而且重要。且看报告人怎样解答它們。首先，他正确地駁斥了社

会非决定論者的主張，社会非决定論者認为科学在揚弃因果概念以后反而变得更精确了。其次，他也正确地指出：不可能拋开观察和試驗，专用先驗、純邏輯的方法得出因果联系。他說明，在社会生活中看到的各种現象的相互联系和这些現象的連續性、再現性，虽然不是永远可以和因果关系等同起来的，但是它們經常"提醒我們去探求原因"。金斯堡把原因了解为若干因素或事实的总和，这些因素或事实，"总起来看，足以产生某种結果，分开来看，每一因素或事实也还是不可缺少的"。按照我們的意見，在这里，金斯堡把現象的原因和发生这一現象的种种条件混为一談了，不过重要的是，他为原因所立的定义毕竟是反对非决定論的。

进而講到社会变迁的具体原因的时候，金斯堡指出来四类因素或事实：甲、自发的个别的变迁（例如語言中的变迁）。乙、社会变迁，也就是社会結构上的变迁，这些变迁的产生，是許多个人向着显明目的共同行动的結果，而結果却也往往不是如所預期的。（报告人举英国1300—1500年間农业变迁的过程为例，当时英国农业变迁的过程使得农民和地主的自然經济被商品生产替代了）。丙、在运动中起着重要作用的杰出人物或杰出人物結成的集团（报告人反对夸大杰出人物的作用，也反对低估千百万小商人、农民和工人的力量，可是他認为也不可对于天才人物作为革新者或作为广大群众力量推动者的作用評价过低）。丁、結构的变迁和紧張——即社会結构某些部分的变迁，这些变迁是被社会結构另一些部分的变迁或被力量均衡的变更引起来的（金斯堡把引起这些紧張和"矛盾"的条件看作是社会变迁的原因，并举反映了資产阶級之日益增强的力量的英国1832年的民主改革作为例子）。

由此可見，連金斯堡教授也并不能够对于社会变迁給出妥善的一元論的解釋，而只是抓住了与出席大会的許多資产阶級社会学家泛泛采用的完全相同的因素說。这种因素說的缺点，在于它并没有解答了这一根本問題：哪一"因素"是第一性的，有决定性的、基本的、主要的，哪些因素是第二性的、派生的。

依照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論，物質資料的生产和經济結构起着决定性作用，从而与所有其他社会現象和社会变迁不同。金斯堡不同意这种說法，可是他又承認，經济結构的变迁常对政治結构的变迁发生重大影响。金斯堡也反对对于象战爭一类的現象与以"片面的"心理的解釋。他認为把心理的因素看作是主要因素，毫无理由。同时，他也把經济因素和政治因素看作是次要的。因此，在这里，令人作嘔的不同因素"平等"說重新出現在我們面前。

金斯堡以为，馬克思主义对于一般人以及政党、阶級和群众的目的与自覚行动所具有的意义似乎估計不足。他的这一看法是完全錯誤的，毫无根据的。剛剛相反，正是馬克思主义才指出：随着社会的进步，随着人民群众对于社会发展規律認識的加深，人們的自覚性会逐步增长，人們参加社会运动，参加社会改造，也日益积极而富有組織性，从而人們的意識和目的更能起指导社会变迁的作用。但人民群众之自覚性、积极性、組織性和开創性的增长也还需要具备物質的、經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以及社会的前提条件。

在大会全体会議席上讀过的其他报告中，我們应当提到巴黎法国社会研究学院ж·大卫教授的报告，題目是"法律与社会变迁"。报告人提出这样的問題：社会变迁是不是让理想的立法者起而运用自己的理智、号召他們开始工作的适当机会？或者說：潜在的合法性亦即法律的泉源，是否就藏在社会变迁里面？但报告人对于自己所提的問題并未作出任何答案，他只是空泛地說到法律与社会及政治变迁有关而已。問題的中心在于：什么是社会变迁？法律以內的变更是怎样产生的？但报告人对这些問題也完全避而不談。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 A·罗易兹教授的报告，是专門用来"反駁"馬克思主义的法律概念的。他否認了把法律看作是社会变迁的結果、而不看作是社会变迁的起因的理論，接着說明：社会和在社会以內居于統治地位的力量支持某些社会价值，这些价值的表現便是法律，因此，法律是造成社会变迁的手段。按照他的意見，司法和行政人員經常是"有意識地或无意識地引起社会变迁的人，因为他們有权朝着一定的方向来解釋和創造法律，而无須經由多数人民或政府立法机关明文賦与以这样作的权力"。

尽人皆知，馬克思主义者也很重視法律之推动和創造的作用，特别是假如所要施行的是先进的、进步的法律的話，这就是說，假如所要施行的法律足以促使新的、更高的社会制度下之先进的、进步的社会关系向前发展并得到巩固的話。另一方面，

馬克思主义者却也令人无可反駁地指出：法律并不是第一性的社会因素，而是正和全部政治及国家制度一样，也和社会的整个政治和法律的上层建筑一样，都是从經济制度派生出来的因素。因此，在为法律的創造作用找出根据以前，先須对被社会經济制度的发展制約着的法律本身之产生和变更予以科学的說明。只有在这样說明以后，才能够解釋，为什么并在什么样的經济关系下面，会产生在社会以內居于統治地位的力量，其利益的表現便是在这个社会以內居于統治地位的法律。

巴西拜伊大学社会科学教授李尔伯图·富列里在全体会議上提出自己的"道德与社会变迁"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富列里也規避了什么是在道德領域內引致变迁的基本因素的問題。报告人討論了这样一点：为什么住在热带森林里面的歐洲人不穿裙子用以替代褲子？歐洲人强迫非歐洲人接受歐洲的服装和建立在狭隘的歐洲經驗上的資产阶級的道德体系，这是正确的嗎？作为社会学上重要的結論，报告人宣称必須考虑到这样的事实：在热带地区的居民中間，居住条件与道德之間的联系不象在北方地区或温带地区的居民中間那样密切。从这种道德論的观点出发，报告人談到了西歐某国的"达官貴人"拒絕招待偉大印度人民的杰出活动家馬哈特姆·甘地，就因为甘地到招待会去的时候穿了本民族的服装。

社会学教授P·恩得里耳也提出以"道德体系与社会变迁"为題的报告。他把道德体系解釋作引导人們的行为使与社会福利相适合的文化特征。恩得里耳坦率反对馬克思的观点，否認生产关系永远起着决定性作用，否認一般的道德价值不过是"生产关系的单純的反映"。他相信，他自己的对于道德的認識不要求他"在下面一个問題上作出任何武断的結論：有物質因素，有精神因素，哪个在人类历史上是第一性的呢？"

由此可見，恩得里耳同样反对对历史予以完整的一元論的解釋，而宁采取实証主义的、折衷主义的因素說，这种因素說对社会发展的物質因素和精神因素哪个是第一性的这一哲学和社会学上的根本問題，置之不理。

恩得里耳否定了人們的生产关系、物質关系在社会、法律、道德以及全部精神生活上所起的带有决定性的作用，躲避了阶級社会中道德的阶級性質的問題，宣傳在阶級社会中有可能取得道德上的一致，而且認为道德在社会变迁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他为道德之唯心主义的观点进行宣傳。但是，如果道德当眞在社会变迁中发生决定性作用的話，那末，且举基督教为例，基督教宣傳爱邻人要象爱自己一样的道德，至今約近两千年之久，为什么始終未能从社会中清除敌意、憎恨、阶級斗爭、民族和种族对抗、自私、利已、吝嗇、貪得，消弭"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爭"，打破資本主义的弱肉强食的規律呢？另一方面，为什么我国劳动人民进行的經济与社会改造，虽其开始距今尙不及四十年，却能够爆破了資本主义残酷規律的基础，根本改变了亿万人的道德面貌，在我整个社会中建立了持久的道德上和政治上的一致呢？其原因就在于：足以决定社会发展和整个社会精神生活的力量，并不是道德，而恰好是經济制度，是生产方式。因此，自从有了私有制，人間便出現了阶級、阶級仇恨、人剝削人的現象以及經济、政治和精神压迫。私有制也把人們分开，让人和人对立起来，使得人們无复有一致的利益，让人們既貪且吝、爭强夺胜、渴求財富、謀取权势，完全不想"爱邻人要象爱自己一样"。与此相反，生产資料的公有制則能剷除剝削、打破阶級的不平等，进而消灭阶級本身，从而把人們联合起来，也把人們的利益結合成为单一的共同利益，并为在精神上培养整体利益的观念，为造福于整个社会，准备下可靠的經济前提。

（三）社会階層呢？還是階級對抗呢？社会流动呢，還是階級鬥爭呢？

在大会的报告和演講中，有資产阶級社会学的两个基本概念被提出来与馬克思主义的关于阶級及阶級斗爭的学說相对抗。这就是"社会阶层"的概念和"社会流动"的概念。資产阶級社会学对馬克思主义的关于阶級和阶級斗爭的学說展开了激烈的斗爭。現代資产阶級的社会学企图指出：馬克思主义的关于阶級和阶級斗爭的概念已經过时了，应当代之"社会层"（страт，或слой—从地質学借用来的一个名詞）和"社会流动"的概念。馬克思的关于資产阶級与无产阶級的对抗日益激化、小資产阶級日益无产阶級化、中等阶层漸归淘汰的理論，似乎未經証实：相反的，中等阶层壮大了起来，而居于

两端的阶层则日益縮小，在資产阶級国家中，連工人們也越来越多地合并到中等阶层以內（自其收入数字与生活水平而言）。

社会阶层与社会流动的理論之所以被提出，其目的在于証明以下的結論：阶級对抗已趋緩和，阶級矛盾和阶級斗爭已为阶級协調所取代。根据这一結論，便認为社会学不应研究阶級和阶級斗爭，而只应研究社会层、社会集团和社会流动（縱的流动和横的流动）。所謂社会流动就是这一层或这一集团的成員向另一层、另一集团的自由的过渡，特别是由低到高的过渡（縱的流动），和人們在空間上改变位置，由这一地区迁移到另一地区（横的流动）。

大会中資产阶級社会学家的演講主要地就是說明上述一点。按照資产阶級社会学家的意見，工人們得到越来越多的財产，买到越来越多的股票，并且越来越多地参加了企业管理，这样，一部分工人已和職員們一道进入中等阶級，而資本家和企业主們則已变成簡单的職員，在国家和社会的监督下管理企业。

如果相信这一理論的話，那末就要承認，在西方，在美国，一般說来，資本家作为一个阶級已經消灭了，摩尔根、洛克菲勒，杜邦、福特以及其他壟断資本的巨头，或者說，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已不复发生任何控制作用，資本家的財产已越来越多地受到国家和法律的限制和监督；而国家和法律所保护的乃是全体社会的利益，不复仅仅是資本家阶級的利益。这样，中等阶級已經是西方世界或資本主义世界之主要的，而且彷彿是唯一的阶級。

另一方面，按照資产阶級社会学家的說法，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級和阶級矛盾不但沒有消灭，沒有被除掉，而且反而成长了，增强了，有了新的阶級和阶級矛盾。得出这种“結論”的根据，就是社会依其成員收入之多寡、職业之不同，劳动性質的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执行的劳动与組織的劳动）以及教育程度等等分化为若干阶层或集团的理論。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被認作是从低的社会层上升到社会精华、进入特殊的最高統治阶級的一种条件和手段。为了証实这些結論，他們广泛地利用了社会精华說、技术統治說、多种修正主义的等級“区分”說、博格丹—斯宾塞尔所提出的社会区分为“組織者与执行者”二等級的理論以及其他。

不可認为資产阶級的社会学家并不知道这类“理論”都是故意造作出来的。例如法国的社会学家ж·谷尔維奇教授就十分正确地指出，社会层的概念完全不能代替科学的阶級及社会分为阶級的概念，因为社会层，严格說来，仅指个别阶級內部的不同阶层而言。谷尔維奇甚至宣称他自己同意馬克思和苏維埃社会学家的見解，把阶級和阶級斗爭看作是社会变迁的主要动力。不过，仔細地加以檢查，就知道谷尔維奇的所謂同意是大有問題的，因为他抛却了阶級所自发生和存在的經济原因，同时主張，任何集体主义，連包含生产資料所有权的移轉在內的集体主义，似乎都不能够泯除社会的阶級分野，因此虽在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社会中，也还要有阶級存在。我們問他：那些是什么样的阶級呢？他回答：这是不可知的，然而只要还有矛盾和斗爭，阶級就不会消逝。他也以为在未来社会中，不会再有象教阶政治那样的阶級統治，他承認未来的阶級将站在“等高綫上”。实在說，在这里，谷尔維奇把“一般的”矛盾当作了阶級对抗和阶級矛盾，把人們的職业差别和阶級差别混为一談，也把社会的阶級分野和人們終生从事于这种或那种職业的情况看成是永世长存的現象。他的这种看法是毫无根据的，旣与事实不合，而且也与历史的发展的客观趋势背道而馳。正因为这样，法国的馬克思主义学者們正确地批評了谷尔維奇的非科学的立場。

社会阶层和社会流动的理論显然带有阶級性，带有阶級的含义。它們旨在掩蔽使資产阶級社会陷于分裂的主要的、最深刻的矛盾和对抗，暗中用細微的、第二等和第三等的人們之間的差别把这些主要矛盾頂替了。它們仅着眼于人們在職业上的差别，在社会職能上的差别以及在教育程度上的差别，或仅着眼于在同一阶級內部存在的各項差别。它們所以要这样作，就是为了迫使劳动人民相信阶級和諧、剝削者与被剝削者通力合作的空想、迫使被剝削者放弃为爭取自己的利益和法权而展开的斗爭。另一方面，这些理論也企图毒害劳动人民的意識，让劳动人民相信：阶級的差别和矛盾是不可能排除的，人們企图消灭阶級的差别和矛盾，那是白費力气。

苏維埃代表团提出被社会全部历史进程証实了的馬克思主义的阶級与阶級斗爭的学說以与社会阶层、社会流动的理論相对抗。我們指出：社会分为

阶級的經济基础是生产資料私有制。今天工人也有了財产，已然变为中等阶級的說法，起源于把生产資料私有制和个人对消費資料的所有权混同了起来。个人消費資料的所有权并不是社会分为阶級的根据。資产阶級社会，包括美国在內，其居于統治地位的阶級并不是“中等”阶級，不是社会的大多数成員，而是为数甚少的极少数人，即壟断的資产阶級，他們拥有具有决定意义的生产資料。壟断的資产阶級絕对“沒有消失”，他們却掌握、支配着国家的命运。所謂中等阶层或中等阶級——小所有者或職員，是依附于大資本家权力之下的。这些中等阶层早就失掉了他們的經济独立，但关于这种經济独立的幻想还継續在他們的头脑中存在着，而社会阶层、社会流动諸理論，即关于“中等”阶級日益壮大的神話，正是对于这种幻想孜孜不倦地加以激发、培养和支持的。

資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的社会性与私人資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間的矛盾，这种矛盾的加深迫使資本主义的思想家們千方百計地来掩飾这种矛盾，因为他們一直沒有发現解决这种矛盾的办法。許多資产阶級的社会学家向我們証明：在資本主义国家中，私有制已成过去陈迹，財产越来越变为“集体的”和“社会的”財产。这种理論在美国哥倫比亚大学社会学教授 B·傅里得曼的报告中得到了最鋪張的解釋。傅里得曼宣称，沒有財产，社会就不可能有一天的稳定，同时他把他自己的关于財产的見解和馬克思主义对立了起来。他說財产分配上的不平等日益减輕，已不处于支配地位。貧富的对比越来越不显著了。收入的分配在所有地区都趋于平等。虽在財富、权力和收益被一小撮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控制着的社会中，也是如此！資本主义的辯护人总是說，財产所有者、托棘斯、卡特尔的自由和权利日益受到立法者的限制。生产資料、运輸工具以及国际貿易中的商品，都越来越“社会化”了。在一系列国家中，正在进行着国有化。甚至在西德，也制定了反托棘斯的法律。不过，連資产阶級社会学家本身也被迫承認，这类法律还只是一紙空文，迄未付諸实施。他們認为已經出現了一种“新型的”所有制，对国家負責的所有制。（資产阶級国家被描絵为保护并反映整个社会之利益和意志的机构！）今天已經不象从前那样国家受財产的統治，相反的，現在財产已受社会的統治。企业管理权不再掌握在一个所有者的手中，而已掌握在股份公司的手中。工人和工会也参加了生产管理。他們征引西德的情况作为例証。財产所有者的权利已經轉移到国家行政人員方面。私有制在任何地方也沒有被取消，同时它在任何地方（!）也不再占有优越和支配的地位，象前一个世紀或象本世紀初年那样。

簡单說来，傅里得曼企图証明，資本主义在所有地方都已經消灭了，假如它还沒有变作社会主义，那末它也已經变为一种新的“集体的”制度，已經变为沒有資本家的社会，变为只有“中等”阶級的社会，变为“管理者”的社会。

美国社会学家佐瑟·伯納德（宾西法尼亚）在其“富有时代的阶級組織（阶級組織的新原則）”的报告中，肯定現代的“工业社会”是朝着无阶級的社会发展的，但朝着这一方向的发展，并不是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立工农政权的道路，而是有賴于“中等”阶級的增长，連无产阶級也被“中等”阶級吞沒了。由伯納德看来，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則，象被斯大林所闡述的那样，在美国已經全部实現了。美国居民的幸福正在不断地增长着。社会經济越来越多地以对于整个社会服务为目的。

不过大多数資产阶級社会学家都避免对資本主义作为整个的制度来加以頌揚和維护，多数人被迫說到并且承認資本主义制度中的多种矛盾和缺点。这恰好証明在人民群众心目中，資本主义的威望已墜落到什么地步，也証明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制度寄以深厚的同情。这又恰好可以解釋为什么資本主义的辯护人总想用現代的資本主义假充社会主义。

在第三次大会上，只有两个报告闡述民族关系上的变化。一个是美国人瓦尔克所提出的“社会和經济变迁对于美国种族关系的影响”。另一个便是本文作者所提出的“苏联民族关系的变迁”。

瓦尔克在其报告中竭力躲避美国人歧視黑种人的具体事实，然而躲避是毫无用处的。他的报告实际上透露这样一个基本观念：在美国，由于全国工业化和乡村城市化的結果，黑人已从种族孤立和种族压迫下摆脫了出来。报告人也宣傳美国的法官以及其他机关和組織如何維护美国社会中所有民族构成一个“完全的整体”的原則，如何連黑人本身也改变了他們的对于美国社会的态度，从而美国社会对于黑人的观感也变更了。他也宣傳，自美国最高法院宣布廢除学校中对黑人的种族隔离之时起，在

美国的种族关系上似乎开闢了一个新的时代。值得注意的是，报告人完全避开本文作者的批評。本文作者說到，不但在各殖民地以內，而且在如美国那样发达的資本主义国家中，种族歧視的現象也还継續存在着。作为例証，本文作者从美国人肯尼迪所著“我在三K党內”和“种族主义的美国便覽”諸书中引征了一些事实。眞的，瓦尔克能有什么話可講呢？諺語說得好，事实胜于雄辯。

民族关系在其他报告中也間接地被談到了，这些报告主要地論述在落后国家和在法、比、英等国所属非洲殖民地境內教育和社会流动的問題。K·布西亚起而为这些报告按地区总結了一下。对于在法属西非的教育原則和实踐，布西亚提出十分怯懦的批評；談到尼日利亚和黃金海岸时，他肯定地說，这两个地区的殖民当局一向对土著居民的教育頗为关怀。然而布西亚本人也必須承認：按照查荷德提供的資料，在黃金海岸和在尼日利亚，識字的人并不多于居民总数的10%，而且这些人就因为他們識字便似乎成为当地的貴族。已經爭取到本国独立地位的黃金海岸的人民大众，以其对殖民者展开的英勇斗爭揭穿了資产阶級用以騙人的殖民政权似乎关怀非洲土著的需要的言論。

正如上文說过的，出席大会的資产阶級社会学家把教育看作是社会流动的因素，看作是从社会的低层上升到高层的条件，也就是构成社会精华、构成統治阶級的条件。

倫敦的Д·格雷斯教授和法国社会学家伊达·貝尔耶（巴黎科学研究民族中心）在他們的报告中以同样的精神来談教育問題。格雷斯为所有講到教育問題的报告作出总結，他說，这些报告是饒有趣味的，但并沒有說明在“工业社会”中教育和社会流动具有什么关系，也沒有說明这种关系朝着什么方向发展。他認为对于下列問題的研究和討論是重要的：如果認为国民教育制度的基本原則应当是“机会均等”的原則，那末，这种“均等”是有利于造就傳統的社会精华的呢，还是有利于培养自覺的、富于責任感的公民的呢？从儿童与其家庭及学校的关系来看，同时考虑到学校对貧穷家庭的儿童所起的作用，“机会均等”将要招致什么样的后果？不过象这一类的問題，資产阶級的社会学家并不敢十分具体地提出来加以闡明。这原是不难理解的，因为一經和事实接触，社会流动的全部理論就显得很不漂亮了。伊达·貝尔耶在其报告中不得不承認：法国的教育制度，象在其他資本主义国家中一样，使得貧穷的父母很难让他們的孩子受到教育，特别是受高等教育，至今高等教育依然是富有家庭独享的特权。在苏联和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中，我們可以看見与此全完不同的一种图景，在这里，經济制度和教育体系对所有公民都保証了受教育的权利。国外很多人都知道这一点，可是偏有一个叫作烏帖辛的人在大会上发表演說，旨在誹謗苏联的国民教育制度，并对于И·А·凱洛夫在报告中提出的材料表示怀疑，他的演說让人想到发自門扉下面的恶毒然而无力的吠声。

由此可見，出席于大会的多数資产阶級社会学家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竭力掩蔽資本主义之日益尖銳的阶級矛盾，竭力規避20世紀的根本社会变迁置而不談。这些变迁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产生、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崩潰、民族解放运动以及亿万人民为爭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而展开的群众运动之巨大的規模和迅速的增长。資产阶級的社会学家力求只描述一些个别的、非突出的現象和因素，只描述第二等和第三等重要的社会变迁，只描述在資产阶級的立法、經济組織、劳动、教育、家庭、宗教等方面进行的局部改革。他們企图用这些变迁假充20世紀的主要社会变迁，竭尽一切可能来添枝加叶地夸大它們的意义。而且資产阶級的社会学家也不能就这些現象和变迁提出任何完整而有系統的（哪怕是有問題和錯誤的）闡述。与此相对，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家却能就20世紀根本的社会变迁作出眞正科学的解釋。

苏联代表团团长П·Н·費多謝也夫与其他馬克思主义者在他們的演說中指明了世界性的社会主义体系之誕生和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之瓦解所具有的重大意义，指明了今日人民群众的作用、自覺性和組織性日益增长的意义。

正是生产方式的变迁、即生产的集中与社会化，才使得資本主义的主要矛盾更加深化。所有根本的社会变迁，即与所有制形式、社会的阶級結构、社会各阶級之社会意識、观念形态、心理状态、社会文化以及科学技术之发展有关的社会变迁，也都是被生产方式的变迁制約着的。从以生产資料私有制和剝削制为基础的社会过渡到以生产資料公有制或全民所有制为基础，消灭了阶級对抗和

人对人的剝削的社会，——这正是二十世紀所有社会变迁之根本的、合乎規律的、不可避免的方向，无論这一方向让一切反动的势力和阶級怎样地疾首痛心。这些无可爭論的历史事实終必駁倒資产阶級社会学的理論，同时証实馬克思主义的眞理。

（四）关於社会學的對象，关於社会學研究的任務和方向

大会对于各国社会学教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組織問題也曾与以深刻的注意。

目前資产阶級社会学研究的主要中心，有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及荷兰。職业的社会学家社会学研究中心，社会学教学机构，社会学刊物，均以在美国为最多。纵覽許多資产阶級国家社会学研究和教学的情况，可以看出美国的影响正在逐步增强。美国在經济、政治、軍事方面的扩張，是被在思想意識、理念方面的扩張协助着的。

为就現代資产阶級社会学所研究的問題获得一鳥瞰的概念，让我們来簡短地說明一下收录在大会参考資料第七卷里面的关于現代社会学研究趋势的报导。約翰·梅治(英国社会学家协会的名誉会长)的撰文說到，由1950至1955年間，英国社会学研究的主題如下所記：

1、社会观念、理論、体系及其他。
2、社会研究方法論。
3、社会結构（包含民主和区位学❶的問題）、社会集团与社会阶层的文化、家庭的研究。
4、生产活动社会学（包含工业社会学）。
5、教养社会学。
6、政治社会学。
7、医疗社会学（包含关于儿童死亡、社会病理和社会医疗的研究）。
8、社会“解体”，包含犯罪、家庭糾紛、两性关系、卖淫、和平与战爭的“心理”因素等問題；这里也包含各种社会对抗的問題。
9、經济社会学（研究貧穷的原因、工資問題、工資政策与收入分配問題、家庭預算問題、及其他）。
10、种族关系。

布魯塞尔大学在下記系科中进行社会学研究：

1、政治經济系（“国家簿記”、經济理論、社会財政、經济測量学“эконометрия”）。
2、社会經济科（关于劳动的社会学研究中心，研究生产劳动、企业关系的問題、也研究“職业的能力支出”）。
3、政治系（选举社会学）。
4、社会图志系（关于城市的专題研究）。
5、社会心理系（社会进步的問題）。

大学社会經济情况研究所用“зондаж”的方法来研究比利时的輿論。大学社会学研究联合中心建立于1949年，由政府支付經費，专就社会阶层与社会流动进行研究，特别注意職員中間的阶层和流动，换句話說，这一联合中心专研究職員的社会构成和社会来源。

象这一类对于社会流动的研究，在許多資产阶級国家中都是經政府与企业主或其組織与公司指派进行的，其研究目的显然在于从公司和机关的職員在政治上可以信任的观点上来“調节”这些職員的社会构成。这种研究也可以被利用来排除企业主認为非良善的分子，被利用来清洗国家机关等等。企业主和資产阶級的政府絕不是为了慈善才津貼这一类的研究，乃是可以断言的。

比利时社会学会成立于1900年，对比属剛果进行民族学的研究。不言而喻，殖民者的实用目的在这学会的研究方向上起着决定作用。❷

許多社会学家不断地抱怨，拿錢支持他們的組織派給他們一些任务，这些任务是和科学风馬牛不相及的。

資产阶級国家各大学的社会学教学也是有着特定的实用目标的，这就是为資产阶級和資产阶級国家培养不可缺少的領导干部，这些干部能够推行資产阶級的政策，能够在社会生活的不同部門中保卫資产阶級的利益。教学工作常是在政治、法律、經济与社会等学系以內进行的。在荷兰，政治与社会两学系担負起社会学研究的組織任务。高等学校里面学社会学的人要学习哪些科目呢？試举比利时的

---

❶ 区位学（экология）是生物学的一部門，研究有机体与其环境的相互影响。在这里，区位学这一名詞被机械地搬运到社会上来。

❷ 加拿大某代表的报告中說到：在69名著名的社会学家中，有42名在大学中工作，19名在政府机關中服务，还有8名在私人企业中服务。这說明了資产阶級社会学家和資产阶級国家机關及私人企业組織的联係。

卢文大学为例，这里学习社会学的学生要鉆研宗教社会学（30小时），犯罪社会学（30小时），經济社会学（30小时），，乡村社会学（30小时），工业与社会关系（30小时），此外还有社会科学綱要（30小时），社会学概論（45小时），实习作业（60小时）和专业实习（在出版机关、科学研究机构以及其他机构中进行）。除經济、法律科目外，尙須鉆研工人問題（30小时），人口統計（30小时），民族学（20小时）以及工业心理学。維恩大学的П·罗森迈尔教授报导：П·格朗德博士（天主教社会研究所所长）現在研究神甫們的族源与社会来源，也在研究維恩各教区的面积及社会构成。罗森迈尔教授本人也正从事于住宅建筑与家庭的研究。

从上述概况中可以看出，資产阶級社会学的研究范圍是何等漫无边际。关于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資产阶級社会学家至今还缺乏一致的了解，以致社会学的对象与方法問題被提出来作为第四次大会討論的主題。

在大会席上，有人說到：馬克思主义者似乎沒有自己的社会学，苏联根本沒有社会学的研究，也沒有社会学的教学。苏維埃代表团有着充分的理由宣布：这种說法是完全錯誤的，而且只能由于不了解作为科学的社会学的內容，才会产生出这样的观点。馬克思主义者过去認为，現在仍然認为：对一切社会現象作出唯物主义解釋的历史唯物主义和从社会現象的相互关系上，从它們的变化和发展上来研究这些現象的辯証的方法，正是眞正科学的社会学。历史唯物主义把辯証唯物主义应用到对社会历史的研究上，应用到对社会生活的研究和解釋上，也应用到对于最普遍的社会发展規律的認識上。列宁把历史唯物主义解釋为与社会学里面的唯心主义和主观主义对立的科学理論和科学方法，这是辯証唯物主义的理論和方法，它們指明社会生活的一切現象是怎样互相联系着的，指明什么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和規律；这一理論指明如何从此一社会形态，由于生产力发展的結果，經过阶級斗爭和社会革命的过程，会产生彼一更高的社会形态，例如从封建主义产生資本主义，又从資本主义产生社会主义。列宁告訴我們，作为历史唯物主义之特征的是，这种唯物主义是唯一可信的、科学的社会学理論，也是唯一正确的社会科学方法（参看“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卷，第274—275，第382—384等頁）。

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反对資产阶級社会学之关于一般社会問題的抽象的、形而上学的和唯心主义的討論；馬克思主义創立了社会經济形态这一科学的概念，并証明社会經济形态的发生、发展及其被取代，是受着客观規律的支配的，不以人的意識与意志为轉移。这样，社会学与历史編纂法便都被放置在科学的軌道上。

馬克思的“資本論”，是政治經济学这門学問上最偉大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馬克思不只分析了資本主义的某些經济关系，不只标明了这一社会形态的骨骼，而且也把它作为活生生的东西描画了出来，“将它的生活习慣，将它的生产关系所固有的阶級对抗的社会表現、将維护資产阶級統治的資产阶級政治上层建筑，将資产阶級的自由平等之类的思想，将資产阶級的家庭关系都和盘托出”（“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卷，第121頁）。这就是說，“資本論”一书，不仅是經济学方面的，而且也是社会学方面的偉大著作，因此，“資本論”的著者也就不仅是經济学家，但又是社会学家。和“資本論”具有同一性質的名著，尙有恩格斯所撰“反杜林論”、“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及列宁所撰“俄国資本主义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資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此外还有列宁所撰关于土地問題、民族問題的多种論著，关于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关于帝国主义战爭的起因、关于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各种最重要运动的推动力的著作，最后还有列宁論如何建立新的共产主义社会、新文化、新家庭、以及建立共产主义教育和道德的許多論文。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奠基人和其他馬克思主义者（其中有經济学家、法学家、哲学家、历史家）的著作中，成长起来眞正科学的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从前民粹派責难馬克思主义似乎否認了眞实的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列宁在回答这种責难的时候写道：“唯物主义的社会学者把人与人間一定的社会关系当作自己研究的对象，从而也就是研究眞实的个人，因为这些关系是由个人的活动組成的”（“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卷，第384頁）。

应当指出：在資本主义国家中，曾有大量社会学的讀物出現，对社会生活許多方面的問題加以論述。撰写这类讀物的，除所謂社会学专家以外，尙有經济学家、法学家、政治学的代表人物、民族学

家，人类学家，文化史家及其他。这类讀物的作家曾广泛利用了研究观察、調查測驗、与各阶层居民进行談話的結果，也广泛利用了統計資料。他們經常从錯誤、似是而非的立足点来对統計資料加以解釋和处理，以致經常得出荒謬可笑的結論。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家一向未曾以应有的注意对这类讀物进行批判，尽管它們在广大知識分子中間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影响到知識分子社会观点和世界观的构成。一部分知識分子本来是同情于社会主义思想的，但陷入到資产阶級理論的迷魂陣中无法解脫。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家应当針对这类讀物摆出自己对于城乡广大劳动群众的劳动，日常生活，文化生活加以研究的具体結果，应当闡明在社会生活变迁影响下劳动人民在意識、心理和道德观念方面的变更。

这样說来，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任务就是十分明显的了。它首先应当研究那些在我們眼前出現的根本的社会变迁。建設共产主义社会的任务要求它作到这一点。我們这个时代的社会科学越来越趋向于对社会生活中某些十分明确的現象进行专門化的研究。这是对的。但专門化并不排除，相反的，它恰恰需要各門社会科学互助合作，以便解决共同的和複杂的問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解釋历史过程的总的理論，作为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有賴于在对一切社会現象就其相互联系进行研究的时候，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来运用它，这样它才能够不断地愈加丰富，愈加具体化，愈加发揚光大。不过，要想从各方面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也还完全沒有在历史唯物主义和各种专門社会科学以外再建立另一門特殊科学——社会学的必要。如果把社会学建立起来的話，这它就要在有关社会的学問中成为一种“科学的科学”，就要站在其他有关社会的各門科学以上，或者暗中頂替了它們。有人認为：从事于专門社会科学研究的人不应当越出自己的窄而深的专业范圍，不应当参与社会学所从事的綜合工作，不应当对自己专門研究的社会現象就其与所有其他社会現象的有机联系进行分析，——这种想法也是不对的。

共产主义建設的实践本身，正在日益頑强地要求我們从事于綜合的、社会学的研究，这种研究要把整个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通統包括在內。举例来說，在全国范圍內合理配置生产力的任务，經济区域化、在东方建立新工业区的任务，建設新城市，改建旧城市的問題，改善城市公共設施、实現文化高漲，树立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改善生产劳动的习慣和条件（在工厂、农业机器站，国营农場、集体农庄中进行改善）等問題，就都要求我們从事于这样的研究。我們也要研究社会主义陣营各国之間的經济、政治和文化关系，研究共产主义教育实践的問題，研究如何克服人們意識和生活习慣中的資本主义残余，研究社会主义与資本主义和平共处，和平竞賽的問題，——这些也要求我們进行一系列深刻而广泛的社会学的考察和分析。

社会学的分析要求我們在研究某种現象，譬如研究經济現象的时候，不但要联系其他經济現象，而且也要联系政治、文化、思想，家庭、生活习慣等方面的現象。試举技术进步这一現象为例：技术进步是被經济制度的性質和在这种經济制度下面产生的物質誘因制約着的，但技术进步也以科学发展的水平为轉移，而科学发展本身又是为生产发展所决定的；技术进步作为生产向前发展和生产力发展之不可分割的部分，轉来又对經济制度本身的变迁起决定性的作用，归根到底，也对所有其他社会关系的变迁，即人們的生产、劳动、休息、与日常生活条件，以及文化生活条件、心理状态的变迁起决定性的作用。社会学的分析有别于技术、經济的分析、要求我們就这一現象的上述各个方面逐一加以考察。

对我們特别重要的是具体地考察和研究生活本身，考察和研究在制造厂、工厂、矿井、集体农庄、国营农場、在城和乡、以及在人們的生产、生活习慣和文化生活中发生的种种变迁。我国科学工作干部和高等学校教师会有很多的人参加到这种考察和研究中来。这种考察和研究不但会丰富我們的社会科学的內容，而且也会使得我們的教学工作活跃起来，使得教学工作富有創造性、和生活本身、和共产主义建設的实际任务密切联系起来。这种考察和研究还会启发我国干部、学者、教师們的創造性，使得他們学会理論联系实际，在对于生活的研究中独立应用理論，廓清在教学工作和在对科学干部的培养中依然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书獃子习气。

* * *

在結束关于社会学家第三次大会的这一报导时，应該說到大会組織的良好。所有講演都用录音机記載下来。参加大会的人都得到了“大会論文集”，其中收录了所有提交大会討論的报告。出席的苏維埃学者得到了用俄語发言的权利，虽然在此以前，只有英語和法語被宣布为大会的工作用語。

苏維埃学者的講演引起了深刻的注意，因为他們对于20世紀的根本社会变迁根据馬克思主义的学說作出解釋和評价。参加大会的人对于劳动，管理、生活习慣、家庭、所有制、社会团体等組織問題、对于計划化、社会学家在理論实踐两方面都和計划化工作发生了关系的問題，特别感覚兴趣。除反对共产主义的法国人阿朗、美国社会学家安得森、和上文提到的、企图批判A·И·凱洛夫的“关于苏联国民教育”的报告的投敌特务分子烏帖辛三人的言論外、大会上再也沒有其他攻訐苏联代表团的发言。阿朗等三人的講演显然沒有得到大会参加者多数的支持。有人企图在自由討論的旗幟下、以“对于20世紀社会变迁的馬克思主义的解釋”为題，組織对馬克思主义理論的专門“批判”。这一冒險的尝試沒有成功，因为对于反馬克思主义的言論，苏联、罗馬尼亚、匈牙利及其他国家的代表——馬克思主义者曾与以应有的回击。鉴于参加大会的人对苏联代表們所作报告的主題感覚兴趣，我們的代表团曾就被大会参加者注意到的問題召开座談会。参加座談的代表人数是很多的。

苏联代表团的参加使得大会的討論更加尖銳、更加深入、更加活潑。荷兰某报甚至这样說：“在苏維埃代表团和‘西方’社会学家的第一次接触中，后者似乎受到了頗大的震动，但很快地就鎮靜下来了，而且覚察：和苏联的社会学家，象和一般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家一样，可以在社会学的所有問題上进行自由的討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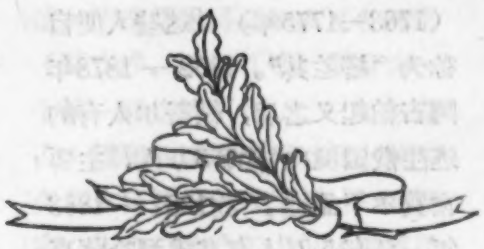
大会选出法国社会学教授乔治·傅里得曼在今后三年內充任协会的会长，也規定了第四次国际大会討論的主題。

社会学家第四次大会定于1959年举行，現在苏联社会学家应为参加第四次大会进行准备，应为作为协会的成員提出报告进行准备。首先应当組織起来社会学会。按照我們的意見，不但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家应当加入社会学会，而且所有从事于社会学研究的經济学家、法学家、民族学家、历史学家、以及各种专門社会科学和社会文化工作者們也都应当加入。

依照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組織的要求，在社会学家第三次大会举行期間，若干国家的代表曾举行会議，討論社会学家应如何协助解决不同社会經济体系的国家和平共处的問題。为便于研究和討論起見，曾經提出以下两个主題：1、“和平共处的理論及其历史发展”，2、“不同社会体系国家間的經济与文化联系”。

出席大会的社会学家对于这些問題的研究寄以浓厚的兴趣；在这里显示出来当代各国人民爭取和平的群众运动的影响。两种社会体系——資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和平共处的問題，是由我們的偉大領袖和导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首先提出来的，列宁奠定了苏維埃政权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础。苏維埃学者完全拥护共产党和苏維埃政府所規定的不同社会体系和平共处的总路綫，那末，也就应当就和平共处的条件积极从事于全面的鉆研。

（張錫彤譯，原載苏联“哲学問題”杂志1957年第1期）



蘇联各族介紹

維吾尔人

維吾尔人——是一个操突厥語的部族。居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維吾尔自治区和甘肃省的，約有400万人；居住在苏联哈薩克共和国、柯尔克孜共和国、烏兹别克共和国和土尔克明共和国的，約有10万人。

維吾尔人，有的以当地地名自称，如“喀什噶尔人”、“阿克苏人”、“洛浦人”、“叶尔羌人”、“鉄克里克人”以及其他等等；有的則以主要職业自称，如“塔兰其人”即“庄稼人”的意思。1921年在塔什干召开的維吾尔人代表大会上，他們的古代名称“維吾尔”被恢复为全族名称（托勒密称为“韦护儿”〔ойхорны〕，东歐和中亚在公元5世紀时称为“骨利”〔гуры〕，中国史书中有“回鶻”〔хуэйгу〕、“高車”〔гаогюй〕、“回紇”〔хуэйхур〕等称謂）。維吾尔人的語言，属于突厥語系东南支。

維吾尔人的人种类型不是单一的。多数属于歐罗巴人种帕米尔—費尔干短头类型（混有蒙古种成分），整个說来，維吾尔人在人种上，与烏兹别克人相似。維吾尔人是中国西北古代居民的后裔，他們的祖先在公元前3世紀至公元3世紀的匈奴联盟中，起过重要的作用。公元4—6世紀时，維吾尔即“高車”，曾隶属于柔然（蠕蠕）可汗；公元5世紀时，維吾尔人的一分部被柔然驅逐到中亚和东歐一带；公元6—7世紀时隶属于突厥可汗。从公元745年起，維吾尔人第一个早期封建国家的統治，扩張到了蒙古西部，在它的基本地区（东土耳其斯坦）农业兴盛起来，与邻国的商业往来也很繁荣。維吾尔人的宗教建筑遺迹（中国甘肃省的敦煌及其他地区）是世界聞名的。在維吾尔人当时的絵画艺术中，可以看出，里面参杂有中国、印度和伊朗的成分。宗教的和世俗的文学（特别是詩）也非常发达，維吾尔的文学語言，在很长的时期內曾經是中亚細亚和中央亚細亚各族人民共同的文学語言。公元9世紀40年代末，維吾尔人遭受叶尼塞柯尔克孜人入侵之后，国家便陷于瓦解。公元10—12世紀，黑汗王朝和蒙古国家时期，維吾尔人大多都是經商、当官和务农。此后，維吾尔人的农业，在东土耳其斯坦的綠洲上，保有它的重要作用。中国清朝政府在平定准噶尔之后，便把一部分維吾尔人迁移到伊犁盆地（1763—1775年），这些人便自称为“塔兰其”。1862—1878年阿古柏起义之后，維吾尔人有的逃往俄国境內（約有5万人，主要在費尔干盆地，在1881—1883年，又有5万人左右逃到哈薩克斯坦）。在中国封建王朝和国民党統治时期，維吾尔人曾經是被压迫的、没有权利的少数民族。可是，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于1955年建立了新疆維吾尔自治区，維吾尔人得到了发展民族文化和形成为民族的可能。

居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維吾尔人，主要職业是农业，种植小麦、黄麻、稻子、棉花、芝麻，特别是种瓜，有些地方的果园和葡萄种植业也很发达，有些地方則栽培桑树。在山区，哈密、和寘、罗布淖尔一带，牧畜业很发达（有馬、駱駝、牛、綿羊、驢）；有的地方也从事捕魚业（罗布淖尔附近、塔里木河下游一带）。在手工业中，織氈业、紡織业、金属加工业和骨刻业，具有若干世紀的傳統。維吾尔人在工业和运輸业中的工人，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数。

农村居住区的配置，通常是一字形的。一般用粘土筑起很高的圍墙，同一宗族住在一起。住房普通都是用粘土和磚坏修建，平屋頂，没有墙基（在黏土屋地地层下，常常用鵝卵石砌上排水渠）。住宅一般是两三間，庄院周圍有黏土筑起的圍墙。

維吾尔人的服飾，在很多方面与烏兹别克人相似。冬季服装有一种特别的头飾（毛皮鑲边的皮帽）。維吾尔妇女，通常穿戴着寬身連衣裙，长筒皮靴，同时也穿短外衣和汉式的坎肩。維吾尔妇女，带面罩并不普遍。

过去，維吾尔人是家长制的大家庭，一夫多妻制实际上只是

流行于富有人家。現在，維吾尔人都是小家庭分居。

維吾尔人的宗教信仰，是伊斯兰教逊尼派，在民間傳統、造型艺术中，都存在着佛教的遺迹。在与农曆有关的节庆中，在民族医术中，也表現出伊斯兰教傳入以前的宗教信仰。

苏联的維吾尔人，形成了两个分支：即謝米列契一支和費尔干一支。前者住在哈薩克共和国阿拉木图省的維吾尔区、恩列克什一哈薩克区、契里克区、納任科里区和伊犁区，阿拉木图市，塔尔得一庫尔干省的潘菲洛夫区和十月区；以及柯尔克孜共和国的伏龙芝、托克瑪克、普热瓦里，歐什以及其他城市；后者住在烏兹别克共和国的依斯巴斯肯特区、帕赫塔阿巴得区以及費尔干盆地城市和地区。謝米列契維吾尔人在民族特点和物質文化上，比之費尔干維吾尔人要更接近于中国的維吾尔人，因为費尔干維吾尔人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周圍烏兹别克人的物質文化和經济形式。

还有很少一部分維吾尔人，只有五百人左右，单独居住在土尔克明共和国的拜拉木一阿里地区。

（弓也长譯自“苏联大百科全書”第44卷）

* * *

莫尔多瓦人

莫尔多瓦人——是莫尔多瓦苏維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基本居民。共和国境外的許多莫尔多瓦族体住在俄罗斯苏維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薩拉托夫、奔薩、高尔基、烏里揚諾夫斯克和古比雪夫等省和塔塔尔、巴什基里亚苏維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以及西伯利亚和中亚細亚。莫尔多瓦人的总人口有1,454,000人（1939年的戶口調查）。

莫尔多瓦人分为埃尔札和莫克沙两个族体。他們操非常相近的具有莫尔多瓦共同基础的埃尔札和莫克沙两种不同語言。莫尔多瓦語言属于芬兰一烏戈尔語系，所保留下来的部落名称“埃尔札”和“莫克沙”，同时也是这两个族体的自称。还有两个不大的族体卡拉泰人和捷留哈涅人，按其起源来說，也是莫尔达瓦人。前者住在塔塔尔苏維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操塔塔尔語；后者住在高尔基省。捷留哈涅人早在18世紀末就接受了俄国文化并操俄語。

莫尔多瓦人現今分布的地区是在伏尔加河和奥卡河流域之間。这里有莫克沙河、苏拉河和阿尔提尔河通过，自古以来就是留下戈罗捷茨文化遺址的莫尔多瓦部落居住的地方。根据考古学文献和語言資料可以推測，在公元9－11世紀，在莫尔多瓦人那里就开始了原始社会制度的瓦解过程，后来在12世紀初至13世紀，在莫尔多瓦人分布的地区上开始形成小封建公国。在蒙古一韃靼侵略时期，莫尔多瓦的土地曾大遭破坏，多被韃靼封建主强占了。这种情况是阻碍莫尔多瓦各部落（莫克沙、埃尔札等）联合为一个統一部族的原因之一。在蒙古一韃靼的压迫消灭以后，莫尔多瓦人自愿地加入了俄罗斯国家，将自己的命运与偉大俄罗斯人民的命运永远联在一起。俄罗斯居民早在12世紀就出現于莫尔多瓦地区，但是大部分俄罗斯移民是在16世紀下半期和17世紀上半期出現于莫尔多瓦人中。莫尔多瓦人从俄罗斯人那里接受了农业上的三区輪种制和建筑技术。

农业很早就是莫尔多瓦人的主要作业。它在偉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前还是非常落后的。莫尔多瓦农民遭受地主和寺庙以及莫尔多瓦富农的殘酷压迫，这些人拥有大量土地。农民們淪为乞丐，当小工（如当縫夫）。

在苏維埃政权年代里，莫尔多瓦苏維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劳动人民在共产党的領导与偉大俄罗斯人民的帮助下，在經济和文化建設方面获得巨大的成就。实行集体化以后，莫尔多瓦的农业变成为大型的机械化的集体农生生产。除去谷物以外，技术农作物如苧麻、馬合烟、馬鈴薯等也具有重大意义。畜牧业（牛、羊）、养禽业和养蜂业都順利地发展起来了。手工业（主要是由于过去农民缺少耕地面积而发展起来的木工生产）在苏維埃时代联合成工艺劳动組合。在莫尔多瓦自治共和国領土上有許多工业企业，因此，形成了民族的工人干部。

莫尔多瓦乡村有街道規划。其中若干乡村，特别是南部草原地区的乡村有很大的規模（300——500农戶。）。住宅建筑是置有俄罗斯炉灶的南部大俄罗斯式的木造农舍。庭院是敞开地，里边建筑是分散的。在无林的原野地区有黏土和土坯房屋。現在，在很多农舍中有城市式的傢俱，从前自制的粗糙的木制和黏土制的器皿已为工厂制的器皿所代替。很多乡村装上了电灯和收

晋机。在莫克沙人中間多半保留着傳統的民族服装。埃尔札人穿的衣服与俄罗斯人的衣服相似。用白亚麻布做的紧身束腰衬衫（Панар），上面配着敞襟长衫是妇女民族服装的主要部分。各式各样的妇女头飾有年龄上的区别，其特点是有大量的金属和玻璃珠，錢币和甲殼类制成的耳环和項圈。过去埃尔札人穿一种罩衫（Палагай）——是一种独特的亚麻布做的鑲着金属鏈边和穗子后边系带的。过去，男人穿的衣服（褲子和衬衣）是用白亚麻布或条紋麻布做的，外面穿的是家織呢絨做的很暖和的服装。冬天，男女都穿短羊皮袄。鞋子是氈或树皮做的，現在，已为皮鞋和防水靴代替了。

莫尔多瓦人早在紀元18世紀时就正式信奉基督教。但是，除了希腊正教以外，直至最近还保留着基督教以前各种信仰的残余。

在偉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前莫尔多瓦人还没有自己的文字。学校中只用俄語教学。莫尔多瓦人識字的还不到4%。在苏維埃政权年代里，莫尔多瓦人創造了自己的文字以及莫克沙語和埃尔札語的文学。莫尔多瓦苏維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普遍地实行了七年制完全义务教育。在共和国內建立了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民族知識分子成长起来了，本民族的作家、艺术家、音乐家和画家也培养起来了。在莫尔多瓦人民艺术中，刺綉得到了广泛傳播。莫尔多瓦的口头文学（史詩、抒情詩、小說等）是非常丰富多采的。說书的Ф·И·别祖波夫和Е·П·克利沃舍夫的作品非常受欢迎。深入地研究民間創作仅仅开始于苏維埃时代。只有苏維埃政权才使第一个莫尔多瓦的語言学家和民族学家M·E·叶伏塞夫能够完成和刊登自己的著作。列宁斯大林的民族政策給人民才干的发揮和他們創作的成长，民族文化的繁荣以及莫克沙人和埃尔札人之形成为統一的莫尔多瓦社会主义民族創造了一切条件。

（曉令譯自"苏联大百科全書"第28卷）

* * *

科米人

科米人（自称科米人，科米雅斯人；在沙皇俄国时代通称为兹里亚尼人）主要居住在科米苏維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此外，也居住在西伯利亚西北部和科拉半島上。人口总共有226,300人（根据1926年的戶口調查）科米語与科米彼尔米亚克語、烏德摩尔梯語相近。这三种語言同属于芬兰—烏戈尔語系帕尔密克語族。在太古时期，科米人的祖先就已住在維契格达河流域。在維契格达河流域和維姆河流域发掘的11—12世紀的古迹（古城址和古坟）証明与卡姆古城和契普察古城相近（与彼尔米亚克人及烏德摩尔梯人的祖先有关）。同时，存在于維契格达河流域的許多文化特征使我們能够看出，这种文化是由于早在公元最初几世紀就出現远古文化綜合性发展的結果而形成的本地文化。科米人在一千年代时就已經和斯拉夫部落有了来往，这种往来在装飾品、工具、陶器的共同形式中反映出来了。科米人同維利基諾夫戈罗德和苏兹达尔—罗斯托夫各公国的关系起初是进貢者的关系，往后是通商的关系。維契格达河的帕尔密（人們把位于維契格达河中游和維姆河下游叫做帕尔密）在13世紀就列入諾夫戈罗德乡。14世紀初，莫斯科的影响扩大到維契格达河和維姆河中游的地区。也就在这个时期，科米人开始改信正教。从14世紀后半期起科米人的土地并入了莫斯科大公国的版图，随着諾夫戈罗德的陷落（1478年），乃并入俄罗斯国家。从11到13世紀，在社会方面科米人經过了原始公社制的瓦解和封建关系形成的过程。具有小封建主特色占有土地的貴族从公社成員中分化出来了。在俄罗斯經济的影响下經济联系和商业联系的发展促进了科米部族的形成（在16—17世紀形成的），这个部族是由許多部落（維契然人、塞索列契人、維姆契人）結合的結果逐漸形成起来的。三百年来科米人的地区是沙皇俄国工业不发达的北部边区。在这种条件下科米人民不可能形成資产阶級民族。在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才开始形成为科米社会主义民族。由于社会主义的胜利，由于边区的經济和文化全面高漲的結果，社会主义民族的形成才有可能：在苏維埃政权的年代里，科米苏維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这个过去落后的地区变成了俄罗斯苏維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一个强大的工农业地区（有采木业、煤炭工业、石油工业），工人阶級的队伍形成了并日益巩固。交通的改善和各个运輸綫的发展对于边区經济和各民族的团結具有重大意义。在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前，由于几乎完全没有道路，由于車輛运輸很不发达，各个居民点之間的

联系是困难的。各村之間的交通只依靠河流来維持。

科米人的主要作业是农业。在共和国的南部地区正在发展作物栽培。在北部地区則有偏重經营乳类牧业的集体农庄。捕获毛皮兽和野禽的狩猎业，打撈河魚和湖魚的漁业也很发达，科米人在彼乔拉河从事养鹿业。科米人多半住在沿着河流的乡村和工业中心区的工人鎮及靠近铁路干綫的地方。他們也居住在采伐木材的地区和便于浮运的地区。在过去，最大的村鎮是有一些小村庄圍繞着的教会区，現在那些小村庄都連接起来，成为一个大的居住区。科米人的住宅建筑类似俄罗斯形式。三开間的房屋是其特点：在两間农舍的中間有天篷（有时第二間农舍作为冷藏室）。庭院是二层楼的，有遮棚和楼梯的（地板用原木鋪成，主要鋪在楼上）。庭院和房屋并排建筑，用两个单坡屋頂，有时是前后建筑，用一个双坡屋頂。

科米人妇女的民族服装好象北部俄罗斯民間的服装（是斜楔形的无袖长衫和短衬衫）。男人（現在也和妇女一样）穿着城市式样的服装。只有在猎人的服装中还保留着某些特殊的装束：大背心、带有底前端向上翘或鈎形的厚底皮鞋，用家織的呢絨做的帽子和长襟外衣。科米伊日姆人和涅涅茨人一样都用馴鹿皮做衣服（鹿皮上衣——带有长袖和把皮毛縫在里面的风帽，上面不开口的衣服；无領翻毛皮外衣——把皮毛縫在外面的衣服，长統皮靴——毛皮的长筒皮靴）。

科米人的民間造型艺术有带采色的几何图案的編織物和紡織物的手工制品（手套、长袜、手巾、桌布及其他等等）。科米伊日姆人的服装是用鹿皮和呢絨做成的花边来装飾的，在傢具和器皿中也可看到絵画和彫刻。科米人的口头文学是丰富多采和多种多样的：歌曲、快板、俗話；特别是內容生动的故事。科米人的民族文字正在发展着。它継承了最初的民間詩人和科米学者И·А·柯拉托夫(1839－75年)的优良傳統。在苏維埃政权年代里，在科米共和国中創造了民族戏剧。研究經济、历史和科米民族語言的科米科学家进行着大規模的科学研究工作。1944年，在科米苏維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建立了苏联科学院基地，1949年改为苏联科学院分院。

（賈之譯自“苏联大百科全書第22卷）

* * *

涅涅茨人

涅涅茨人（自称涅納茨人）——散居在西起科拉半島东至叶尼塞河右岸的广大地域上，其中間杂有科米人、俄罗斯人和其他族的居民。涅涅茨人主要集中在涅涅茨基(原阿尔汉格尔斯克省)和雅馬尔涅涅茨（原秋明省）两个民族州中。过去他們沒有共同的名称：住在塔兹河以东的称为尤拉克人，塔兹河以西的叫做薩摩耶人；雅馬尔州以南沿普尔河住的是所謂森林涅涅茨人（片哈薩沃人、汉达雅尔人）。涅涅茨人的語言属于薩摩耶語族。根据1926年調查，涅涅茨人口总共約有17,000人。根据流傳最广的說法，涅涅茨人的祖先是迁居到北方的薩揚斯部落（大約在公元1千年代），后来同北西伯利亚沿海的当地人混杂在一起。涅涅茨人同俄罗斯人来往大約开始于11世紀。到16世紀，涅涅茨人的全部土地都并入俄罗斯国家。过去涅涅茨人的主要作业是养鹿业，也使用牧犬。由于經营水平低下，鹿隻大批地由于流行病和飼料不足而死亡。其次，他們还从事技术原始的捕魚业和狩猎业。差不多所有的涅涅茨人都是游牧民。冬天他們住的是用鹿皮搭起来的帳蓬，夏天是用白樺树皮搭的帳蓬。穿的衣服也是用鹿皮做的：男人的衣服有鹿皮衣、无領翻毛皮外衣，女人的衣服有套头皮衣，同时长統皮靴也是用鹿皮做的。涅涅茨人从俄罗斯人那里学来了使用新劳动工具、織布、制作过去对他們沒有作过的食品和新的傢具。直到苏維埃政权建立以前，涅涅茨人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生活中还保存着氏族制度的残余——如部族和氏族的划分，异族通婚和彩礼制度。在西伯利亚的涅涅茨人中間，自然經济占优势，而在西部涅涅茨人中，小商品經济占优势。随着阶級分化而来的是对貧困人的剝削，这种剝削往往是在各种氏族残余的掩飾下进行的。除了受当地的富农剝削外，涅涅茨劳动者还受到俄罗斯人和科米人中的商人和富农的剝削。在宗教信仰方面，涅涅茨人信奉盛行薩滿崇拜的黃教。有一部份涅涅茨人（特别是西部的）信仰正教。

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从无权地位，受压迫，貧困和愚昧无智的状态中解放了涅涅茨劳动人民。所有涅涅茨人都联合成了集体農場。（下轉31頁）

宣傳党的民族政策和介紹我国各兄弟民族生活的綜合性雜志

民族團结

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圖文並茂·通俗活潑

讀者从这里可以看到關于党的民族政策和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問題理論的論述；可以看到在党的民族政策照耀下，各民族地區政治、經济、文化各方面的日新月异的变化；可以看到独具风格的各兄弟民族的文学艺术、生活習尚；也可以了解到各兄弟民族的历史及社会經济基本情况。它是我国各族人民特别是汉族和少數民族之間相互了解的桥樑，更是民族工作者和教師的良友。

每期售价1角6分　預訂一季三期4角8分　半年六期9角6分

各地邮局办理預定，书店、报摊、书亭均有零售。讀者如訂购不到者，欢迎逕函北京国子监特54号本社发行科邮购。

民族出版社出版　全国各地郵局发行

民族問題譯叢

〔月刊〕

1958年2月号

（总第24期）

2月4日出版

編輯者	民族問題譯丛編輯委員会 北京西郊 电話：(9) 0771
出版者	民族出版社 北京国子监特54号
總發行处	邮电部北京邮局
訂購处	全国各地邮局
代訂代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定价·

全年（12期）2.40元

半年（6期）1.20元

三个月（3期）0.60元

国内平寄邮費免收

訂費一律預收

零售每册0.20元

中央民族印刷厂印刷

印數：1—4.300